

葡人初來地“貿易島” 或“屯門島”應是南頭島再考

施存龍

葡人來中國初到地，葡人記作 J Veniaga (貿易島) 或 Ilha Tomon (Tamão) (貿易島)。究竟具體是哪個中國島嶼，四百多年來一直是個難解之題。僅從 1836 年瑞典人龍思泰在《早期澳門史》中釋作新寧縣上川島算起，一百六十多年來東西方學者提出不少說法，均未能解決問題。筆者鑒於寫中國港口史和澳門史的需要，從 20 世紀 80 年代起就追索這一問題的鑰匙，不揣淺陋，在 1997 年澳門《文化雜誌》第 33 期出版的拙文〈“屯門島”——葡人始上中國據點考辨〉首次提出是我國航海書上所標的南頭島一說。為了聽取內地更多學者的反響，經補充從另一角度寫了〈葡萄牙人早期在廣東活動地 Is. Tamao 應為我國何島？〉於 1999 年在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主辦的《海交史研究》第 1 期上發表。同年更進一步寫了〈葡人入居澳門前侵佔我國“南頭”考實〉，在中國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辦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2 期澳門專號上發表，繼續申述南頭島說，後得中國人民大學全國報刊資料中心通知，該文被收載於《中國地理》卷中。

愚見除發現內地有所反響外，2003 年 7 月在國家圖書館還發現旅居葡國的金國平先生在《西力東漸》論文集中心述評拙文。我十分感謝金國平先生不吝指教，借以推動我作更深入的研究。現寫成第二階段修訂稿。本文內容分八大部分：一論貿易島即“屯門島”；葡人記其在該島活動與中國記載他們在南頭或屯門海澳活動同。二、辨幾種新見 Tomao 解說。三、辨南頭各種同途地名，發現清初南頭島地名。四論大濠島即南頭島關係並駁大濠島名始於清末。五論中外古今航海圖書反映“爛頭島”即南頭島之訛。六論南頭島作過葡人據點參考旁證。七論大嶼山說殊途同歸，但缺乏證據，最後還添上補論。

葡人貿易島、屯門島 究為中國何島

一、葡早期文獻中所謂中國的“貿易島”和“屯門島”是同一島。在早期葡人來華有關的葡國文獻中，常有 Ilha da Veniaga (英譯 Island Trade) 和 Ilha Tamou (英譯 Island Tamao) 二島名出現。我國現代學者通常譯作“貿易島”、“貿易之島”和“屯門島”。

1521 年在廣州被捕入獄的葡囚在偷發出的信件中說道：“另一（中國）官員稱，1520 年，他受廣州大吏之命去貿易島收稅時”“迪奚戈·卡爾沃停泊在貿易島……”1522 年，中葡發生西草灣戰事時的葡方首領末兒丁致函國王“彙報中國之行情況”說：“我甫入這人

稱貿易島的港口”⁽¹⁾該兩文獻均未說明中國地名。

戈伊斯 (Damião de Gois, 1502-1574)《唐·曼努埃爾王編年史》中稱費爾南於 1517 年“8 月 15 日來到了 Tamam Labuá 島，該島距陸地 3 里格……逕直往泊 Tamam 島。……他則返回了 Tamam。他在那裡逗留了十四個月……派人在 Tamam 及廣州 (Cantam) 四處喊話……”⁽²⁾還有皮雷斯《東方諸國記》也屢提“屯門島”。

1512 年 4 月，葡人托梅·皮雷斯 (Tomé Pires) 到達滿刺加 (今馬六甲) 葡屬殖民，在總督阿伯奎手下任商務秘書。他在那裡搜集情報，於 1515 年寫成《東方諸國記》或譯《東方見聞錄》(Suma Oriental)，正是葡人阿爾瓦雷

斯 (Jorge Álvares, 澳門譯作歐維士) 首航中國珠江口屯門一帶歸去滿刺加後第二或第三年。

該書原稿早佚散，1937 年在法國國立圖書館內發現一抄本，由科特桑 (Armando Cortesão) 譯注，於 1944 年在英國出版。我國學者此後有摘譯引用。20 世紀 80 年代，夏茂先生將其有關中國部分全文譯漢，以“1515 年葡萄牙人筆下的中國”為題刊出。

皮雷斯在〈中國沿海諸地〉一節中說：“從交趾支那接近中國海岸的邊界開始，要塞堡寨綿亘不絕。首先是海南 (aynam)……，其次是南頭 (Nantoo)，接着是廣州、漳州 (Cham Cheo)……”在〈來自馬六甲的帆船所停泊的島嶼〉一節中又說：“從廣州朝馬六甲這一方

向行三十里格，在靠近南頭大陸的地方有一些島嶼，那就是已指定給各國的泊船口岸（即屯門島）與其它島嶼。一俟所說的這些帆船在彼泊靠，南頭的領主就通知廣州方面”。⁽³⁾在〈馬六甲商品在中國的估價〉一節中又說：“如上所述，我們所說的這些來自馬六甲的帆船是在距廣州二、三十里格的屯門島外拋錨泊船的。這些島嶼鄰近南頭陸地，與大陸僅相距1里格。那些來自馬六甲的帆船在屯門港停泊。……南頭的領主一見到這些帆船，立刻就通知廣州方面說帆船已駛入該群島。”⁽⁴⁾

譯註者科特桑對“屯門島”註說：“皮雷斯進而還說道，屯門與廣州相距二十或三十里格。……皮雷斯還說，屯門與大陸上的南頭相距1里格（3.2英里）……”卡斯坦埃達、巴羅斯以及戈易斯（Gois）皆說 Tamão 或 Tumon 距大陸3里格。不過，由於錨地是在屯門島的西側，而南頭是在東面，故而乍看起來似乎皮雷斯的說法與實際情況相去不是太遠。羅德里格斯的地圖（第40幅）上首次繪製了這個島嶼，但僅僅記載着：“‘中國帆船在此島嶼外停泊’。他所指的帆船是那些由馬六甲來廣州河〔施按，當指珠江〕的帆船。該島的位置處於一條大河的北岸附近，在河口上標着：‘中國海峽之峽口。’儘管在1554年L·奧梅姆的地圖上首次出現了‘Ilhas da Veniaga’（貿易島）與‘Ihas da Cantam’（廣州島）這兩個包括屯門在內的地名，可知道在任何地圖上都不曾記有‘Tumon’或類似的名稱。皮雷斯的記述表明早在葡萄牙船舶在屯門停泊之前，屯門就已成為來自馬六甲的船舶的錨地；在這一點上羅德里格斯的地圖進一步證實了他的說法。”

上述《唐·曼努埃爾王編年史》和《東方諸國記》又都祇稱“屯門島”，未及其它。那麼，在葡人筆下的早期中葡關係史上的“貿易島”與“屯門島”究

係何種關係？這在下述幾種也是早期葡人史料中可得明確答案。

1563年出版的葡國御用史家巴羅斯《亞洲旬年史》中明確說：“費爾南……始入廣州城港及 Tamou 島或我們人稱之為貿易島附近的島嶼時，根據當時攜帶的華人領航員的建議，全在該島停泊休息。”……⁽⁵⁾16世紀前葉的卡斯達聶達《葡萄牙人發現征服印度史》也稱：“我們來到了貿易島，此島距海岸3里格。華人稱之為 Tamão。我們則稱其為貿易島（da Veniaga），因為在那一帶稱商品交易為 Veniaga〔施按：這是馬來語，中國商人在自己國土上是不會如此稱呼的，是葡人主觀的話〕。來華貿易的外國商人的貨物在此島上交易〔施按：我疑公開的交易應是在大陸屯門澳進行，不會到大嶼山去進行；祇有逃稅走私貨才可能到該島港口偷偷進行，由於作者分不清屯門澳水域不是依托在該島，所以才有此混淆說法〕。”⁽⁶⁾

解決“貿易島”即“屯門島”之後，餘下來的問題是“屯門島”應為我國何島，這是中外學者最關注的核心問題。

二、西方文獻記載早期葡人在 Tamao 島活動的情節與中國明清文獻記載佛郎機人在南頭島嶼或“屯門海澳”活動的情節相符合。

葡史料記載葡人到 Tamao 島活動是從1513年開始的，而中國明代史料對1513-1516年均無記錄，記錄是從1517年開始的。為方便對照，我們選1518年西蒙抵島情況。巴勞斯《亞洲旬年史》記載：“有關我們的人在 Tamou 澳的所作所為情況。這些情況屬實。”接着，該書舉例說：“廣州大吏信函稱我們搶劫抵達屯門澳的外國船隻，阻止他們行商，不繳納關稅。一主要官員 foam 前去同我們的艦隊司令交涉此事時受到虐待。……西蒙……始抵 Tamou 島，為長遠貿易之計，認為第一件應該作的事情便是築起一石木結構的堡壘並將大砲置於要害處。”⁽⁷⁾當時〈廣州葡

囚信〉也寫道：“另一官員稱，1520年他受廣州大吏之命去貿易島收稅時，佛郎機打壞了他的官帽，對他拳打腳踢，還扣留了他。”⁽⁸⁾這是16世紀葡人當事人和歷史家記述1518年駐紮在 Tamou 島的商船隊長西蒙一伙行為片斷。我們再看隔了三百年後第三國西方歷史家在研究史料後對西蒙一伙的論述，為節約篇幅，亦僅舉二例。1836年出版的瑞典代理商兼澳門史學者 Ljungstedt（龍思泰）《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 in China》（前譯《葡萄牙人在中國居留地史》，近譯《早期澳門史》）言：“Simao 於1518年帶領一艘大船和三艘中國帆船到達該港時……他建築了一座堡壘，完工時僭稱對該地擁有主權……拒絕撤離該島。”⁽⁹⁾（原書把 Tamao 與上川島混為一談，譯者糾正作屯門島或屯門）。英軍海軍司令魏爾斯萊（Marquis Wellesley 或譯韋爾斯科等）侯爵所藏文件，也說到1518年新任葡艦隊司令西蒙“不得到許可，就在屯門島上建起碉堡，從那裡出發，抓住一切機會對進出中國海港〔施按：僅指珠江口而已〕的所有船隻進行洗劫，或榨錢財，他把海邊年輕女子帶走，擄掠中國人為奴。……而在他統率下的水手和士兵則照他的榜樣行事。”⁽¹⁰⁾

這與中方史籍記載如前述退泊南頭後所作所為內容一致。也與《明史·佛郎機傳》中說他們在那裡“築室立寨”並“掠買良民”一致。雖然中國史家不知其小名西蒙（Simao）。

葡人到廣東珠江口初期為明代正德朝後期和嘉靖朝開元，那個時期中國官方和個人的刻骨銘心的記錄主要是佛郎機人即葡人的海盜行為。最早官方記載如作為中央政事編年史的《明實錄·正德期》就屢有反映。

在正德十二年（1517）辛丑條內說：“兩廣奸民，私通番貨，勾引外夷與進貢者，混以圖利。招誘亡民，略買子女，出沒縱橫，民受其害。”⁽¹¹⁾由

於在該年之後四年，已有幾批次葡船到達廣東，該年又有葡船隊後繼而來，且當時除了葡人以外，東南亞進貢小國是不敢也沒有略買中國人口、出沒縱橫的，所以這一外夷，無疑是佛郎機人即葡人。該《實錄》正德十五年十二月（跨入1521年）已丑條則明指葡人“遂掠買人口，蓋房立寨為久居”，同時同條還有御史丘道隆、何鰲揭發的奏本。何鰲說：“佛郎機最兇狡，……留驛者違制交通，入都桀驁爭長。”要求把他們“悉驅在澳番船及番人潛居者。”⁽¹²⁾這裡的“澳”指的是屯門澳和大嶼島上的港澳，“番人”即《實錄》所稱“夷人”也就是葡人，“番船”即葡船。在明代文獻中，對葡人由於不瞭解，誤稱為佛郎機泛稱時，則稱“夷”“番”。嘉靖九年時任給事中的王希文奏文回顧往事稱：“佛郎機……擄掠男婦，設柵自固，火銃橫行。”⁽¹³⁾成書於萬曆年間的《殊域周咨錄》亦追憶說：“佛郎機……殘暴殘虐，遺禍廣人”。那麼這個“設柵自固、火銃橫行”的地方在哪裡呢？省、縣地方志都說在東莞南頭。據嘉靖版《廣東通志》記載：“佛郎機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船突至廣州澳口。銃聲如雷，以進貢請封為名。……撫按查《會典》，無舊例，不行，遂退泊東莞南頭，徑自蓋房樹柵，恃火銃自固。”⁽¹⁴⁾該《廣東通志》事紀還說他們“後謀據東莞南頭”。⁽¹⁵⁾嘉靖三十一年中舉的葉春及編寫的《順德縣志·何鰲傳》說：“佛郎機以入貢為名，兩臺〔施按：指廣東巡撫、按察使〕不許，遂治區脫〔施按：即區脫，指葡人在海疆擅築堡壘〕東莞之南頭。”⁽¹⁶⁾也點明葡人在“南頭”佔有殖民據點。清康熙時欽差杜臻巡視澳門，在其《閩粵巡視紀略》中寫道：“正德中，佛郎機國稱朝貢，闖入東莞南頭樹柵而居……多為不法。”乾隆間，澳門海防同知印光任等《澳門紀略》中也言及葡人“退泊南頭，樹

柵自固”⁽¹⁷⁾。清代前期，郭文柄修《東莞縣志》卷十四〈外志〉稱：“正德十一〔施按：應為十二〕年，佛郎機夷人始入廣州，謀據邑南頭，副使汪鉉逐之。”從“逐之”看葡人並不止在圖謀，有已佔據的意思。那麼這個“南頭”指哪裡呢？未明言。

以上是一種記載體系，我們再來看另一種記載體系。

明萬曆五年評事陳文輔〈都憲汪公遺愛祠記〉不稱在南頭而說在“屯門海澳”：“近於正德改元，忽有不隸貢獻惡夷，號為佛郎機者，與諸狡猾湊雜屯門、散涌等處海澳，設立營寨，大造火銃為攻戰具，佔據海島，殺人搶船，勢甚猖獗。虎視海隅，志在吞併，圖形立石，管轄諸番。”⁽¹⁸⁾設立營寨、製造武器、圖形立石等必須在陸地，在水上是辦不到的，當然要“佔據海島”的據點。但這個海島叫甚麼也沒有明言。到了清代地方志追述前代之事時，往往祇片面稱葡人“佔據屯門海澳”而漏言佔據海島。如《新安縣志》卷十一〈寇盜〉稱：“正德十二年，番夷佛郎機入寇，佔據屯門海澳。”卷十〈名宦汪鉉〉：“正德十六年任巡視海道，番夷佛郎機假朝貢，佔據屯門海澳，時肆剽掠。”道光版史澄《廣州府志》卷三十八介紹汪鉉生平事蹟中，也稱“佔據海澳”。

以上所引明清史料，在敘述同一歷史事件時，使用着兩種不同的地名。我們應把退泊的“南頭”，佔據的“海島”和佔據的“屯門海澳”聯繫起來考辨。所謂“退泊”於南頭，“治區脫”於南頭，“謀佔邑南頭”，“闖入東莞南頭……而居”，都說明同一個情況：葡人佔據南頭為據點。那麼，結合“佔據海島”一語，這個“南頭”該是何地？

對幾種新見 Tamao 島解釋的辨析

對於早期葡人筆下的“貿易島”、“屯門島”對應中國為何島，筆者在前幾文已對老生常談的多種說法，諸如

上、下川島、伶仃島、大茅（貓）島、舵尾島、大門島、屯門島、屯門港（澳）等，一一辨析，論其不是，茲不再重複。近年，我又搜集到一些新生稀談，計有蛇口港說、大鏟島說、三灶島說等新說。

一、蛇口港說

研究中葡關係史的前輩張維華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中，為《明史·佛郎機傳》作了注釋。他引譯葡史家Barros著作，介紹葡使團船隊來華後的停泊地稱“先停泊於屯門島（Tunmên）”，又介紹首航葡人“Jorge de Álvares 東來，至廣州之屯門島（Tunmên），並在此建立石碑，以為發現之紀念。”並指出：“屯門為東莞縣之海島。”⁽¹⁹⁾據迄今檢索，他是我國最早譯作“屯門島”者。但從葡人來之前和之後，東莞乃至廣州各縣從未有屯門島實名。然而經他一倡，半個多世紀迄今，中國流行起並不存在的“屯門島”說。

然而到90年代初，張先生在晚年一反五十多年前陳說，在他主編的《中國古代對外關係史》中提出屯門地望的新主張：“明廷下令將佔據屯門（今廣東深圳蛇口）的葡人驅除。”⁽²⁰⁾

最近新出的大部頭《中國通史》（明對期卷）裡，他說：“正德十六年……明朝下令將佔據屯門（今廣東深圳蛇口）的葡人驅逐。”⁽²¹⁾觀點完全相同，僅有無關緊要的一字之改。

按蛇口灣在南頭半島東南側，南頭半島是古屯門鎮和寨的故地，也是唐宋故屯門澳和明代改稱南頭澳的所在地。因此，我認為張先生新解釋並不比他自己過去的舊說更接近事實。

蛇口這個地方，筆者住下考察過多次，去看過原蛇口漁港和蛇口鎮及80年代初新開闢的蛇口商港和蛇口工業區。在它現代化開發前自然原貌是大大致可代表明代面貌，那裡原本是五個淺水小海灣，所以初築碼頭在基本上利用其自然情況條件下，祇是幾百噸

級，後來因利用其隔海即英佔香港新界的元朗地方的政治經濟優勢，才不惜投以鉅資，以現代挖深工程大規模擴建。所以還原來面目，並非天然良港。在縣、府、省三段地方志中，也從未提到過曾經駐泊外國商賈船。我查過舊中國海關資料，原蛇口漁港不過是晚清、民國時代與香港邊境小額民間貿易口岸而已。諒因蛇口港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運動的先聲和特區雛型，知名度很高，遠播海內外，諒必因此被附會上歷史。這一影響還不祇此二例，我還發現王毓銓主編的《中國通史》第15冊，即王熹執筆的《明時期》上冊，在敘述葡中關係史時也說：“葡萄牙人於明正德九年（1514）首先抵達廣州沿海的屯門島”，“正德十六年（1521）以御史邱道隆、何鯨力奏，明朝下令將佔據屯門（今廣東深圳蛇口）的葡人驅逐。”表明也是不承認葡人活動於今香港九龍的屯門，認為是在南頭海防基地！

二、屯門半島說

此說是1999年新問世的前述《粵澳關係史》中提出來的。該書第一章中寫道：“戰役發生的地點，葡文資料稱為Tamão島，中文資料則說是東莞屯門（今屬香港），《新安縣志》更具體指明主戰場是屯門澳海澳的九運山。屯門是個半島，三面環海，新來乍到的葡人還不熟悉當地環境，稱之為島，以後將錯就錯地在一段長時間裡仍稱為島，是完全可能的。澳門就是一個實例。平托《遠遊記》稱‘澳門從前是個荒島’。而且Tamão之中文譯音為‘塔曼’，與‘屯門’的確發音相近，亦不失為一佐證。由此看來，早期葡文資料所說的Tamão島就是屯門半島，而所謂Tamão港，也就是屯門澳。”我認為這一新主張，需要辨析商榷。

第一，16世紀西方殖民主義向海外“發現”活動將外國或異族土著居住地搞錯地名、地理位置、地理性質將錯就錯之例是有的。哥倫布把中美洲稱作

“印度”，大陸當作島嶼即是，但葡人在Tamão島問題上，不屬這類性質。不能以葡人對澳門的從前叫法作為將錯就錯的實例來佐證葡人在Tamão島為島的問題上。平托稱“澳門從前是個荒島”並沒有錯。因為不僅澳門就連香山縣全境從前確實是個島，連中國自己在明及以前地圖繪出的就是那個形象，後來隨着珠江下泄泥沙的淤積才使它們變成半島，海域成為內河。

第二，既然屯門澳是在所謂“屯門半島”（因地理書上未稱其為半島）上，而屯門澳乃是廣州港的主要外港（當時），如果外國商船為了貿易停泊在這裡，港內海防駐軍當然允許，賴皮停在那裡臨時和暫時尚有可能，但若是佔領幾年則是不可能的。作戰時，把若干葡艦圍困在澳內是可能的。但難“屯門戰役”二百幾十年後嘉慶《新安縣志》作者的描述，未必真切。我們還應以接近事件時期的文件為思考定性的依據。

三、三灶島說

臺灣學者吳緝華在《明代社會經濟史論叢》一書中稱：“正德年間，佛郎機—葡萄牙乘篷船來到中國，第二年，費爾諾比勒司又以佛郎機船四艘開到廣東，碇泊在三灶島。”⁽²¹⁾書中未注出依據理由。在無法與作者對話的情況下，我們祇能通過分析來評定此說是非。

三灶島是甚麼情況呢？查《廣東省海域地名志》可知：“原名三灶山。北緯20°02′，東經113°21′，在珠海市西南部，橫琴島與南水島之間。岸線長56.3公里，面積80平方公里。其上有三石如灶，故名。主要由花崗岩構成，多為山丘地。主峰欄浪山，海拔297.2米，處東南部。植被茂密，以灌木、喬木為主。淡水充足。有居民1.1萬人，耕地2萬畝。設三灶鎮，……農產有水稻、甘蔗、花生、蔬菜等。明成化之年（1465）於南部建統城。……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在此建飛機場，大肆屠殺，‘萬人墳’、‘千人墳’遺址為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有公路長48公里，每日有班船來往香洲、灣仔、井岸。”⁽²²⁾我要補充一些歷史情況是：明代洪武二十六年。該島“奸民復通番為亂，二十六年指揮花茂殲其魁，悉遷其餘黨，禁民不得耕種。其東為烏沙海，其西為浪白澳。”葡人初來廣東時的正德時，該島屬香山縣境。

根據以上該島歷史情況和中葡雙方記載，我認為三灶島不可能是葡人所說的“屯門島”。

第一，中方文獻地方志都明確記載正德十二年（1517）葡船突入的是東莞縣境，而非香山縣，地點不符。

第二，葡人目的地是廣州港謀求進京和貿易。其停船地應接近珠江口，使團船怎會停泊到僻遠的荒棄的三灶島呢？既不便聯繫外交活動又難以作貿易。

第三，三灶島與Tamão島名毫不對音。

第四，葡方歷史文獻記載首次使團事甚詳，但都未記載葡人費爾諾比勒司——當指1517年來廣東的葡船隊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即現在常譯的安德拉德，停泊過三灶島。16世紀葡史家記載是泊於Tamão島，葡人所描述的該島特徵一條也不符合三灶島。

四、大鏟刀說

近年出版的《深圳古代簡史》在否認葡人所記Tamao島為大嶼山前提下，提出此一新說。

該書說：“‘屯門島’更有可能是南頭直線距離2公里的大鏟島”，“費爾南在那裡蓋房結寨，以為長久之計。”⁽²³⁾後來，深圳博物館陳海先〈歷代深圳海防的設立〉著文進一步肯定葡人侵佔了大鏟島。⁽²⁴⁾

把Tamao島定為大鏟島是前所未有的新發明。在評論之前，有必要先看一下它的概況，以助思考。

該島位於珠江口伶仃洋內，靠近深圳經濟特區的南頭半島，相距僅2公里餘。筆者迄無機會登島考察，茲特引省、市有關資料如下：

據《深圳市地名志》稱：“大鏟島（舊稱大傘、大山）在蛇口區約2.3公里的海面上，為航道必經，從清朝開始至今都在島上設海關，稱九龍海關大鏟分關。島高117.8米，面積為0.64平方公里。島上現有駐軍、海關、檢疫、航運、小學等單位。島形似鐵鏟得名。”大鏟灣在島東，灣深4公里，孤長20公里，水較淺。現建有丁字式碼頭，主要供報關船海關檢查用。

另據《廣東省海域地名志》補充如下：“又名大鏟。北緯22°30'，東經113°50'。內伶仃島北10公里，東南距大陸2.25公里。長1.76公里，寬0.5公里，岸線長4公里。由花崗岩構成，長有茅草。泉水幾處。附近水深4-9米。島上有一自然村，名大鏟村，原有150餘人，1979年大部遷蛇口，今僅30餘人。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島上設海關稱九龍海關大鏟分關，1951年歸廣州海關管理，今為大鏟海關，有邊防檢查站、衛生檢疫站、通信站。有燈樁。北與小鏟島間水域為檢疫錨地，可泊2,000噸級船。”

我耐心研究後，認為不可能的理由是：

第一，持此主張者沒有提出任何歷史文獻依據和出土文物佐證，而從猜測出發論定。

第二，葡人記錄 Tamao 島與南頭陸地相距3里格15.76公里，而大鏟島實際祇距2公里，相差太遠。

第三，“大鏟”與 Tamao、Tamen 等均不對音。

第四，該島是珠江口海防要地南頭半島的前哨，不可能容得葡艦盤踞多年而安然“和平共處”。由於某種特殊事故臨時依島停泊一下也許可能。在通常情況下，因它處於把關的南頭半島之裡，南頭山上海防瞭望哨視線之內，一發現外國船要進來，就會立即派巡邏船去盤查或引導到規定外港或驅趕之，決無可能任其停幾年並營建工事作據點。

第五，葡人若據該島，既能守住，又難作隱蔽的走私活動勾當。該小島向無商業活動。

第六，四百多年後的當代僅有居民150人，那麼四百多年前恐無居民，頂多漁民臨時去生產，與葡人奴役當地居民記錄不符。

以上各島說，雖都在南頭海防圈內，卻都對不上號。讓我們收縮在帶有“南頭”地名的範圍去搜索吧。

“南頭”地名辨

一、“南頭”一名在明清作多種地名用：

作墟市名。收載於明永樂初編成的《永樂大典》的《廣州府圖經》中東莞縣墟市名單中，有“寶潭、土瓜、南頭……”⁽²⁵⁾這是迄今從文獻上追索到的最早的“南頭”地名。

作城名。嘉靖對黃佐主編的《廣東通志》卷六十六稱：“東莞南頭城，古之屯門鎮。”（屯門鎮是唐代設的軍防單位）明初，洪武十七年（1384）建成，供東莞守備千戶所，洪武二十七年（1394）建城，供東莞守備千戶所作城。萬曆十一年（1583）南頭城（重修參將府）載：“舊府位於城南，迄今二百餘載。”倒推二百餘年，則是洪武十來年，則建城前已有參將府。正德五年（1510），城內東南隅，建備倭總兵署。⁽²⁶⁾葡人文獻上所說 Pi-o，就是指這裡的備倭總兵。

作寨名。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撤銷元代相沿的屯門寨，併入固戍寨。後於嘉靖四十四或四十五年復設寨，改名南頭寨。⁽²⁷⁾取此名諒與“南頭市”有關。寨的長官署在東莞千戶所城，原參將署。即今深圳市區的城子崗南頭城內。筆者曾於2002年11月在深圳大學參加中外關係史研討會後前往考察該城。但南頭寨兵營駐在南頭半島前方海濱赤灣一帶。

作軍哨名。清末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二十稱：清代“水師標左營，……分防五汛：一、蓮花濠；二、南頭炮臺；三、第洲墩臺；四、屯門；五、深圳。”⁽²⁸⁾這裡的南頭汛——南頭炮臺應該指在南頭半島，筆者在當代南頭赤灣建現代化港過程中曾幾次去那裡，那裡有清代遺留炮臺廢址。鴉片戰爭中此炮臺曾發揮過作用。

作津渡名。康熙《新安縣志》地理卷津渡有“南頭渡”口名，設南頭半島至省城、東莞縣城、佛山鎮三條內河航線。

作澳名。明嘉靖時《籌海圖編》在論廣東海防衛所時，稱廣東中路東莞縣有南頭、屯門等澳。南頭澳當指南頭兵營所在地附近即今南頭半島的港灣。在《卷梧總督軍門志》圖上演海標有“南頭”並有說明詞一行：“南頭兵船泊此”，想必就是《籌海圖編》所說的南頭澳。

作海名。“南頭海在南頭一里。兩粵諸水合珠江，經虎門透南山，逶迤而東。海中有島、白石對峙中流。”⁽²⁹⁾

作水道名。在珠江口，在牛頭島-桂山島一側與南頭島即大濠島-索古列島為另一側之間的水道稱為南頭水道，又名大濠水道。⁽³⁰⁾

作半島名。我國航海界使用的《中國航路指南》和航海圖有“南頭島”的地名，指今香港地區的大濠島亦即大嶼山。它的淵源可追溯到明代文獻記載葡人侵佔為據點的地名（詳後），由於古書記載不能明確，後人頗難辨別。

二、“南頭”一名是指南頭半島還是南頭島，最易混淆，要視上下文具體情況而分辨之。如上述明《軍門志》所說“南頭海防參將一員……駐紮南頭”，前一個“南頭”指南頭寨，後一個“南頭”指南頭半島之南頭城。清《新安縣志·海防略》稱：“萬曆十四年，總督吳、御史汪會題：南頭即全廣門戶，控制蠻倭。”此“南頭”是指南頭半島。因為它伸入伶仃洋硇石水道，扼出入珠江口門戶虎門，是廣東省會水路要口。明《籌海圖編》中講廣

東中路的南頭重要地位時，這個“南頭”也指南頭半島。而明《廣東通志》和《順德縣志》講佛郎機人侵擾時說他們“退泊南頭”，“治區脫”於“南頭”，這個“南頭”就切不可仍理解為南頭半島或南頭澳了，而是指屬南頭備倭管轄與南頭半島有一段距離又較偏僻的南頭島。

我國有的著作把“南頭”祇解為南頭城或南頭半島，在有的情況下就會陷入誤解或曲解，與事實和情理不通。

我國大陸出版的《中國史稿》明代卷說：葡人從馬六甲來到珠江口後“以武力侵佔東莞南頭，在‘屯門、葵涌〔施按：原文誤寫‘浦’〕等處海澳，設立營寨，大造火銃，為攻戰具’。”“竊據南頭的葡萄牙海盜更加肆無忌憚，剽劫行旅，掠買良民、無惡不做。”⁽³¹⁾這裡所說，看來是綜合本文上述明代《廣東通志》和《祠記》來的，接近事實。但因該書未說明這個“南頭”的含義，人們不能不理解為通常含義的南頭即南頭半島（恐怕作者本身就認為如此），因此讓讀者迷惑或走入誤區。

我以為此說難以成立。首先，1510-1521年間南頭城為東莞千戶所和備倭總兵衙署所在地，是廣東中部海防司令部前駐地，不可能讓葡人作殖民據點（當時雙方力量對比，中方仍處優勢）。1521年，中葡在珠江口發生“屯門之役”，指揮此役的最高司令員汪鉉（時任海道副使）在臨戰前賦詩一首，題為“駐節南頭喜鄉耆吳瑗、鄭志銳畫攻屯門夷之策賦此”⁽³²⁾，詩題和內容明白說明與葡人開戰之前，汪鉉駐紮在南頭城，而且得到南頭當地居民士紳的協助，即吳瑗等策劃作戰方案。如葡人已據南頭城或南頭半島和港灣，還談得上汪鉉駐節在那裡嗎？

其次，如果是指南頭半島沿岸的港灣——南頭澳，那裡是廣東海防體系中重點軍港，也不可能供外國初來（無政府勘合文憑）商船停泊。外國商船另有指定的商港。

明代文獻如嘉靖《廣東通志》介紹海防中有南頭澳地名：“備倭分三路：中路在廣州府東莞縣南頭、屯門等澳，大戰船八艘、鳥艚三十艘。”⁽³³⁾嘉靖時海防專著《籌海圖編》廣東事宜的“中路”節中，論及日本入寇，在進不了廣東東路柘林等地的情況下，“其勢必越於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為尤甚”⁽³⁴⁾。這說明當時有屯門澳和南頭澳地名並存。明萬曆時海防專著《蒼梧提督軍門志》地圖，雖未見標“南頭澳”，但在南頭寨左側前端海域，標有“南頭兵船泊此”說明詞。⁽³⁵⁾泊軍艦的地方，當然意味着是澳。稍後，萬曆二十三年寫成的《粵大記》廣東沿海圖上，雖然既未標“南頭澳”，也未標“兵船泊此”字樣於海域，但在南頭半島東側和西側的兩個海灣內，分別繪有兵船圖⁽³⁶⁾，表明是泊地，不言而喻是南頭澳所在。這裡是軍港，是《籌海圖編》特別強調“尤甚”的防倭寇要害，又不曾失守，絕無可能成為葡人佔據的殖民地，所以不會是《廣東通志》所說“退泊”和《順德縣志》所說“治區脫”的“南頭”。

再從16世紀到東方來的葡人著述流露對南頭備倭權威感，也說明當時葡人不可能佔據。生活在1500-1550年並在東方住了十年的康士坦尼達（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說過：“掌管這一帶海防事宜的官員叫Pi-O〔按指明代設置抵禦倭寇入侵的武官備倭都指揮〕，他駐在……南頭寨。”⁽³⁷⁾

三、已發現清初文獻反映南頭島名存在的下限為明末。

香港沈思先生考證稱：“近代流通的地圖及海圖上，對大嶼山分別稱為：達豪島、南頭島、爛頭山、大濠島、連頭島等等”。把南頭島、大濠島說成近代才有，這是不對的。實際上，大濠島、南頭島名明代已存在。大濠島來歷留在後節講，這裡先集中講南頭島明代

已經存在。除間接稱名已查明葡人初來時已存在，如前述。直接稱名，近已發現其下限在明末。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施琅率清兵進攻臺灣，臺灣鄭氏政權降清。十月，詔官府將沿海內遷人民（順治十八年，新安縣開始強迫沿海居民內遷）復歸遷界前土地村莊。十一月，清廷派出工部尚書杜臻等策劃復遷事。次年五月事畢，杜著《粵閩巡視紀略》，詳列新安縣復界的大陸沿海村名和海島名。在開列上下屯門等一大串大陸沿海村名後，接着稱：“暨佛堂門、大奚山、鵝公澳、榕樹澳、白沙澳、雞棲澳、南頭、香港、塘福、梅窩、石壁、螺杯澳、大澳、沙螺灣諸海島，皆移並遷，共豁田地一千三百五十幾頃有奇。”⁽³⁸⁾杜書記錄是據勘察現場實有官民共事的記錄。這裡明確將“南頭”與香港等列作海島。會不會指南頭半島或其裡的南頭城呢？不會。理由是：南頭城是新安縣所在，雖離海很近，但它是海防司令部所在地，不是順治時遷老百姓住界的對象，因而也就不成為康熙時復界的對象。何況那裡是大陸半島，不是海島，不會列在復界島嶼、島澳、島村名單中。

這裡還特別請注意：杜臻是不承認大奚山是大嶼山的說法的，而認為大奚山即是老萬山。他在同書中說得明白：“大奚山在合連海中，俗曰大姨。又有小姨山與俱峙，……後有萬姓者，據之呼為老萬山。《籌海圖編》載其名，明祁順有大奚山詩。”⁽³⁹⁾可見他所說“南頭”島是與香港島、大奚山即老萬山鼎立的三個不同島。梅窩、石壁、螺杯澳、大澳、沙螺灣等村名、港灣名又都是南頭島上的。

杜臻遷復的海島是清朝開國第一代皇帝順治時的名稱。而這些島名及其居民乃是明代的沿名和遺民。因此，可以確定明末已存在南頭島島名，這是下限。對於它的上限，現在尚未發現可以說明的直接史料。祇能原則上

斷定在南頭城始建即洪武二十七年，才有可能。

大濠島與南頭島 存在異名同地關係

金國平先生在〈Tumon 雜考〉一文中，對1997年首篇發表南頭島說的文章評論說：“首先，作者未出示有明確說明‘大濠山’即‘南頭島’的明清漢籍。”尚未發現金先生希望看到的漢文書籍中直接瞭當的記載，這是事實。不過，拙文已提供了記載當時葡人佔據南頭備倭管轄島嶼以及“退泊南頭”、“治甌脫”於南頭的漢籍，已在較大程度上說明了問題。本文在上節又提供清初杜臻著作中遷海名單中的“南頭”島名，並與香港島並列，供大家研究。

大濠島與南頭島關係，前文也經論證，現再加申述和訂正。

一、對照明代兩份廣東沿海圖，正確認識《軍門志》上的“屯門澳”。

始編於嘉靖初，修訂於萬曆間的《蒼梧總督軍門志》廣東沿海圖上把“屯門澳”標在離岸海域中，在其下有一方框文字說明：“此澳大，可泊東南風。至老萬山二潮水，至九洲一潮水，至雞公頭半潮水，至急水門五十里，至虎頭門一潮水”。（見附圖1）⁽⁴⁰⁾

對照萬曆三十年成書的《粵大記》廣東沿海圖上，相當《軍門志》“屯門寨”說明詞的位置上繪出一座山島，該山島一端標有地名“大澳”，另一端標有地名“大濠山”，表面看，《軍門志》所標的“屯門澳”，似表示為海中島嶼。故林天蔚先生在〈16世紀葡萄牙人在香港事迹考〉認為這個海中“屯門澳”代表大嶼山，它與大陸屯門澳並存於東莞境。⁽⁴¹⁾有的學者對其提出異議，指出《軍門志》中的“屯門澳”所以會標在海中大濠島位置上而沒有標在大陸岸邊，是因說明詞較長，圖上大陸岸空間安排不下，以致借用本應繪大濠山位置的空間刻寫了“屯門澳”名及其說明

詞。意思是，說明詞蓋沒了大濠山，並不表明“屯門澳”等於大濠山。所以，“屯門寨”仍應指在大陸岸邊一個，不是海中又有一個屯門澳。⁽⁴²⁾

我以為這一評論有一定道理，對我也是一種啟發。反省我在前文對此點論述，也有類同誤解。現作修正：在明代正德、嘉靖朝即葡人初來時，屯門澳應該祇有一個，即大陸九龍半島西邊的屯門澳（今青山灣）。《軍門志》圖上所謂“屯門澳”，不知是嘉靖初原著者應標，還是後來萬曆時修訂者劉堯晦，文不對題地把大濠山港灣情況寫在屯門澳名下，致使後人讀者產生誤解。現在我

認為“此澳大，可泊東南風……”一段說明，實際應指大濠山西北隅大澳、東西涌等。因島北港灣才適宜泊避東南風，以及“至老萬山”需“二潮水”等航程相符。否則實難說通情理。如果此“屯門澳”是指大陸的屯門灣（澳），則與此說明不符合。第一，屯門灣並不大。該灣“灣口介於琵琶洲與其西方約2.5海里的柱咀之間……縱深2海里”⁽⁴³⁾，可見灣內面積不大（這是指天然情況說的，明代至20世紀中期無多大變化，現在灣內經兩期填海造陸，水域面積縮小得多，不計在內）。第二、大陸屯門灣灣口朝南，正愁避不了東南



〔圖1〕《蒼梧總督軍門志》中的〈廣東沿海圖〉（部分）

風，祇“能避東北季風”⁽⁴³⁾。與“可泊東南風”豈非正好相反？祇能指別處灣口不朝南或東南的港灣才能避東南風。第三、候潮所至各地。或是島嶼（老萬山、雞公頭、九洲均是島，九洲即今珠海市九洲港外的小島），或是航門水道（急水門、虎門）。按珠江口各島均為不正規半日潮，即大致一晝夜二次潮。這意味着基點是在一個珠江口航路要衝的島嶼上，合乎情理。第四、它說“至急水門五十里”，按大陸屯門灣至急水門北口不過約14里，所以不會是，祇有大濠山西北隅至急水門才會約有五十里。

二、明代的大濠山即今的大濠島

1) 香港地區最大海島名大濠島

中國地圖出版社編製並於1966年初版，1983年第5版的《中國地圖冊》中，在廣東省圖、珠江三角洲圖上，在香港島的西南，有一座比香港島還大的島上，明標着“大濠島”島名。1982年廣東省測繪局編繪由廣東地圖出版社出版的《廣東省縣圖集》中，在珠海市圖（頁12）、深圳市圖（頁24）也都分別標作“大濠島”。

在當代中國編繪出版的供航海者專用的海圖，多張也都標作“大濠島（南頭）”；有的則在該島上標“南頭（大濠島）”。我國航海界使用的大濠島這一地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西方海圖也已譯用。如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英軍繪製的《珠江水道圖》，對該島稱作Tyho，這顯然是“大濠”島名的音譯，島上又標有中文“大濠”，無疑正是大濠島上西部一港灣“大澳”的異寫，仍不離名從主人。清末光緒二十六年即1900年，由國人陳壽彭編成的《中國江海險要圖志》對該島也標作“大濠島”。

大濠島之名，並非始於清代後期，更非始於現代或當代，而是有更早的淵源。

2) 大濠島是從大濠山演變來的

地誌出現大濠島地名前身的下限時間在明萬曆，可知葡人初到廣東之

時，已經存在。前述明萬曆年間，主編《廣東通志》的郭棐，他以個人名義編寫的《粵大記》，於萬曆三十年即1602年出版。其中廣東沿海圖，在“外伶仃”島和“下磨刀”嶼之間，有一座相當大的海島，標有“大濠山”三字（見附圖2）。在該島上，還標有大澳、石壁、塘瓊、東西涌、梅窠村、螺盃澳、沙螺灣等地名。這些地名，在今天的大濠島上大多仍在使用，無論從地圖上找實際生活中都可找到（祇是有的用字有所改動，如“塘瓊”，將

冷僻字“瓊”改為“福”，“梅窠”的“窠”改寫“窩”而已）。不過從圖上看，當初大濠山還是該島上局部山名後來才代替全島名。

螺，是廣東沿海人民喜食的牡蠣的地方性名稱。這個地名的產生和使用，與當時當地島上居民以漁鹽維生，挖螺養螺，取其生產生活中熟悉事物為名相符。後來，大濠改為大濠，可能出於文人對其雅化，這與澳門在明代原名“濠鏡”，後來改為“濠鏡”出於同理。古代對海中的山也往往稱山不稱島，如明



〔圖2-1〕萬曆三十年（1602）版郭棐《粵大記》附圖（左頁）

代舟山，現代改舟山島。綜上證明大濠島前身為大嶼山。

但是，當代有的學者甚至是與地名工作有關的學者，不知道明代已有“大嶼山”這一島名的淵源，祇知道英國殖民佔領軍與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後都用“大嶼山”一名稱該島，尤其是港英政府法定此名為通用地名後，反而不認大濠島，甚至當作錯誤批判了。

三、大濠島起源並非始於清末

香港沈思生著文〈大嶼山地名的考證〉，其中“大濠地名的錯誤”一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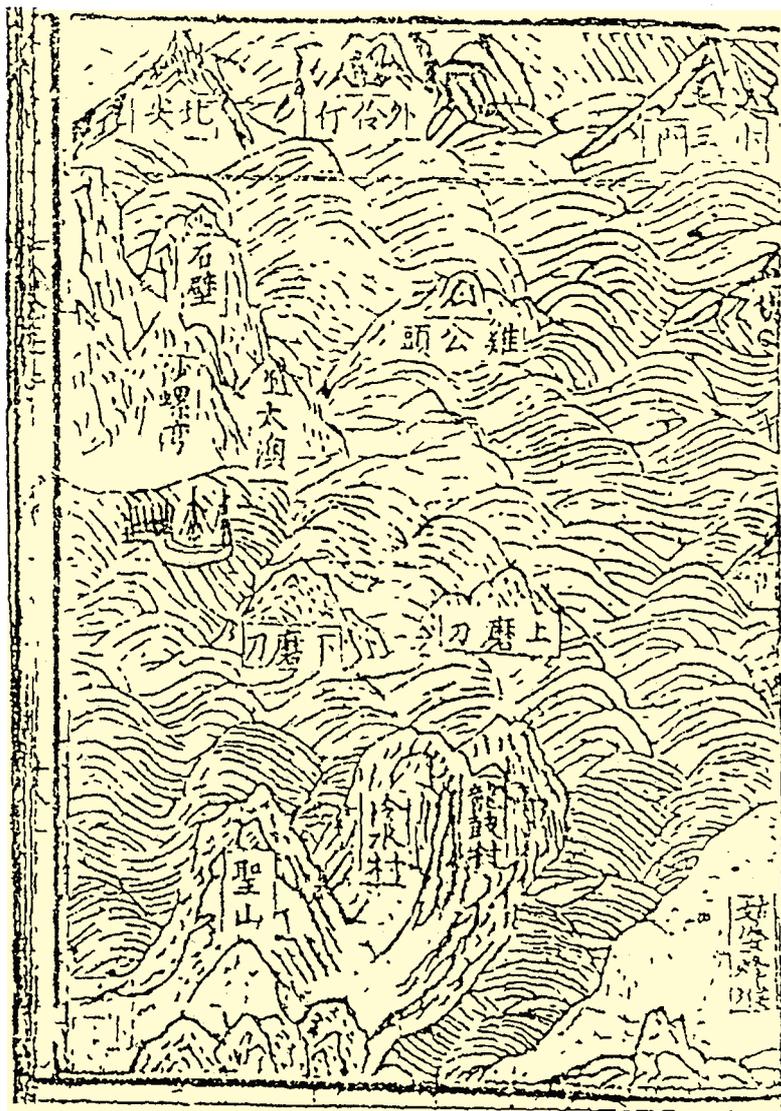
稱：“1990年陳壽彭翻譯英國海軍資料，編成《中國江海險要圖志》，志中首次用中文稱大嶼山為‘大濠’。觀察志中輿圖的大濠位置，其實是大澳所在。大濠可能是由大澳訛轉而來。”“陳壽彭翻譯英佔軍原圖本時，並沒有參照最新的《廣東輿地全圖》，將 Tyho 誤讀為 Ty-Ho，亦因大嶼山北中央有一地名為‘大濠’，清末時在此設汛地，他將地名誤解為大濠，故在中文寫上‘大濠島’。……可見‘大濠’實是漢文倒譯時的錯誤。”並批評1976年出

版的海圖和1982年版的《廣東省縣圖集·深圳市》圖中稱大濠島的不是。⁽⁴⁴⁾其實這一批評並不對，以錯誤批評了正確。第一，1833年英軍圖上使用 Tyho 作島名正是反映了主人所稱的“大濠”島名，沒有可詫異的，不應該認為它是代表“大澳”而錯怪人家。第二，陳壽彭翻譯英軍原圖，將 Tyho 讀作 Ty-Ho 是對的，批評他是誤讀就不對了。第三，沈先生認為該島上在清末設汛地“大濠”，“他將地名誤解為大濠，故在中文寫上‘大濠島’”。其實清末設汛地時命名，正是根據大濠島原有地名而命名的。第四，沈思認為：“可見‘大濠’（島名）實是漢文倒譯的錯誤”⁽⁴⁵⁾，其實這並不是從英文倒譯成中文而來，恰恰相反，是英文從漢文音譯過去的，在中文書籍中，正確地還原成中國原用漢文名。第五，沈思認為解放後，中國中央和省級編繪的地圖仍用“大濠島”是不對的，是未改善，祇有改名為“大嶼山”才切合實際，才“是符合歷史事實的”。此論不妥。若依了沈先生此論，是非混淆了，反而會使本來符合歷史事實的變成不符歷史事實了。

四、大濠島概況

大濠島為今香港地區最大島，面積141.6平方公里（不包括填海後擴大之面積），約為香港島一倍。島體山勢蜿蜒，由東北走向西南，主峰鳳凰山高934米、大東山869米。全島均為丘陵山地，海岸大多為懸崖峭壁，僅山溪下游有數處谷地，如梅窩、東涌、石壁等，多為居民點所在。雞翼角炮臺傳為明代所設。西北岸的大澳，為島北重要集市（當地稱“墟”），一條小溪注入澳內。另一北岸集市東涌，始建於南宋，今留清代城牆鐵炮，有小碼頭。島東南的居民點梅窩，小河縱橫，為農業水鄉。大嶼山三大瀑布之一的銀礦布和古代遺下的銀礦洞均在此。梅窩西南的貝澳亦為明代村落。⁽⁴⁶⁾

該島是海上進出廣州港和其歷史上外港屯門港要衝。其西側與桂山島、牛



〔圖2-2〕萬曆三十年（1602）版郭棐《粵大記》附圖（右頁）

頭島水域稱南頭水道(有的地圖標有“大嶼海峽”),是東南方向來的海船進出珠江口必經航道。其東北側為馬灣島、大陸的大欖埔之間為急水門水道等,為香港島、九龍半島、大鵬半島及其它東來北來海船進出珠江口的必經航道。

該島海岸有多處港灣適合古代帆船停泊,故歷史上常成為外來逃難船選作落腳地。如南宋末朝流亡政府及其殘餘軍隊被元軍追擊南逃時,益王趙昰在福州稱帝,改元景炎。次年繼續南逃至珠江口,景炎三年三月就駐扎該島(時稱碙洲),四月死於島上。立其弟衛王趙昺為帝,很可能就在該島登位。

由於大濠島的地理位置,島況以及港灣特點,也常被外來入侵者和海盜佔作船隊的停泊基地或據點。如前述提到的荷蘭人經營的“番鬼塘”、英國人船舶的停泊地、張保仔的大規模海盜窩。

該島最西南的一個海角雞翼角,兩側有小海灣稱東灣和西灣,據說“番鬼”也有在此過冬。該島西南部有一稱為二澳的海灣,岸上二澳村後有一條瀑布,葡萄牙私泊船可能來過汲水。

五、大濠島就是我們求索的葡據島嶼“南頭”

1) 探索南頭島的幾個原則

要找準明代文獻上所指葡人盤踞的“南頭”,首先要超脫狹義界限,而按廣義概念,又要按文獻所說“東莞南頭”,限在東莞縣境內去找。從海防角度論,應在南頭備倭總兵、東莞千戶所管轄範圍內。

其次,不應在大陸找,那是緣木求魚,而應在島嶼找。因為西方史料一致說在某島。我國《都憲汪公遺愛祠記》也明示“佔據島嶼”。

再次,應適應葡人之需要及其力所能及。葡人找意圖久居的殖民據點,必有可供多艘船舶避風的港灣,又有淡水、食品、燒柴、建築材料、面積較大、有一定回旋餘地和便於固守一時的地勢,不會找不毛之地的小島。南頭澳、屯門灣等大陸海岸灣當然較理想,

但那裡都駐有中國重兵,他們不能打敗明軍取而替之,唯有在珠江口範圍內找較偏僻、明軍防衛力量較弱,或易於買通明軍佯拒而陰許之地並為他們有限的人力、物力所能及之地。

最後要有歷史和現實證據。

2) 大濠島符合以上四條原則。

第一,大濠島在行政區劃上符合在東莞縣境內。就海防管轄範圍而論,它又屬南頭備倭總兵和東莞千戶所防區。

第二,它是海島,符合中外記載是島的條件。

但是在東莞縣境、南頭寨防區有許多海島也都符合條件,所以起決定作用的還在於第三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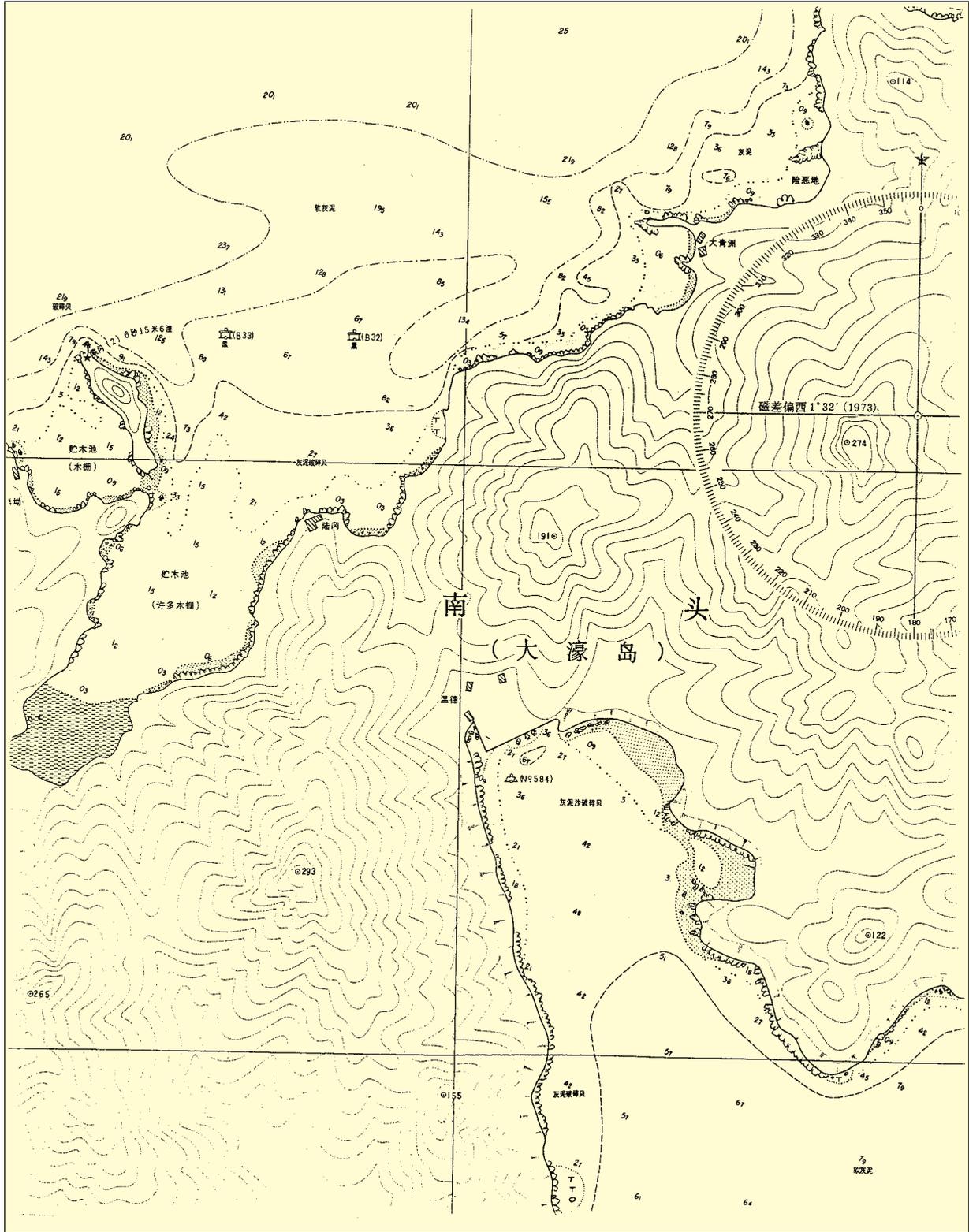
第三,它適應葡人需要和力所能及。

初來葡人目的,是想至少像印度果阿、南亞馬六甲那樣在中國沿海建立商站、殖民據點,然後看可能伺機滅亡之。這從他們在印度、馬六甲等地所作所為、從國王下達調查中國情況的提綱,從皮雷斯給國王送去的情報中講中國人“易制服”,“十艘戰艦就可沿着海岸攫取整個中國”(47),從被囚廣州卡爾馬等人向國王提出滅亡中國計劃的密信,都說明懷有此種心機。不過話得說回來,當時來廣東葡人裡多具冒險家衝動,但也不是完全不顧自己能力的妄動分子。在他們自知無法正面攻取大陸沿岸的屯門港和南頭基地的情勢下,必然想尋找一個比較偏僻、無中國常備守軍或監管很鬆弛又具備一定條件的海中孤島作為立足據點。而大濠島正是他們力所能及的佔據對象。然而,珠江口大量島嶼中屬於沒有中國守備或管理鬆弛的還有許許多多,為何偏偏是大濠島呢?這就取決於該島的許多條件符合葡人意圖的需要。第一,此島處航路要衝附近,但又遠離省會廣州、東莞縣城各約二百里和百餘里,與珠江口海防司令部南頭城也隔海相距,據點選在島北和島西則相對較遠,減少廣東當局戒心和防範,他們便於在一個相對放任的環境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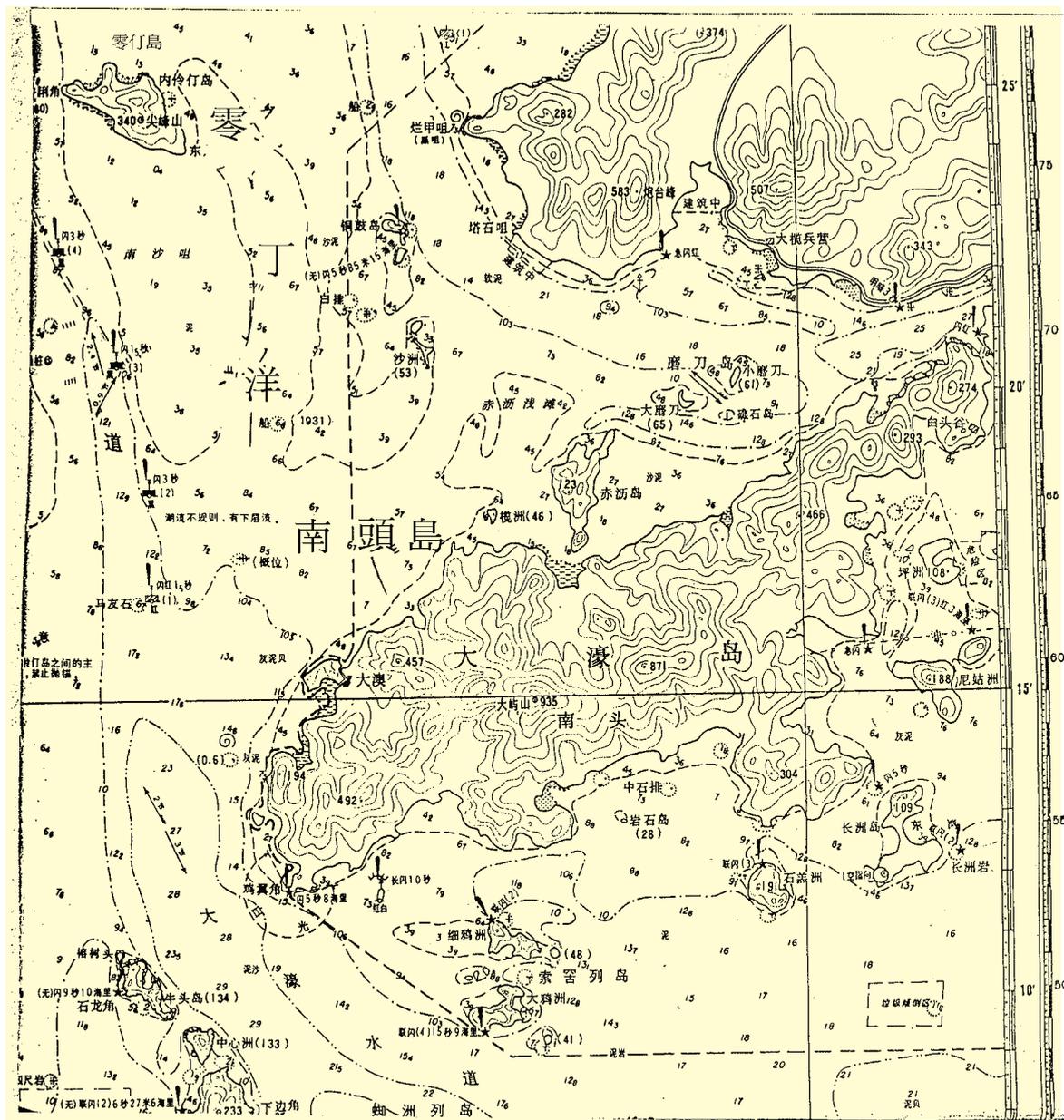
進行違背中國法制的海盜活動。不像在屯門港裡那樣,中國官兵要監視並干涉他們,不許上岸住,不許商品偷漏稅,不許欺壓其它國家商船人員和中國居民,更不許搶劫等等。第二,有多處天然港灣可供他們的艦船寄泊和修繕,且容量不僅可泊當時多艘葡船組成的船隊,而且以後再增幾倍也有後備餘地。第三,島大為珠口諸島之首,為香港島二倍,島上多山亦有小量谷地平原,有足夠大面積供遊擊回旋餘地,有險可據,便於建堡壘防守。第四,因有天然河溪、瀑布,淡水資源充沛,也不乏木材、柴草、野味、糧食、魚鹽資源供應,可以維持基本生活。第五,當地有居民,可供僱傭或強迫為他們服役。也可就地誘拐、買賣、綁架人口,或作為從他處買來、綁來、騙來的婦女、兒童匿藏、出口之地。總之,早期來的葡萄牙人優選大濠島是有其殖民專業眼光的。無怪,首航領頭人阿爾瓦里斯(歐維士,Álvares)作為先驅者加以青睞,並豎起象徵“發現”“佔有”的有葡國徽標的石碑;繼他而來的作惡多端的西蒙等人也都踏着他的足跡退泊到此島來。

中外古今航海圖書上明確反映南頭島即是大嶼山——大濠島

金國平先生在上述文章中,還稱拙文南頭說乃“所徵引資料僅為作者本人於1979年編定的《中國水運地理詞典》。”事實上,該拙文以相當篇幅徵引了《中國航路指南》中南頭島即大濠島的資料五條,又徵引航海圖上在南頭島名下注有大濠島的實際圖例,不知為何視而不見、避而不談?《中國航路指南》和航海圖是供全國軍、商、漁、海上工程多方面航海者使用的指導性工具書,是對眾多的生命財產海上移動安全負責任的工具書,是千萬船長長期積累的經驗教訓,專業海上測量工作者和研究製圖者共同勞動的結晶。它的簡本也向國際來華海員發行,非同一般,應予重視。



〔圖3〕中國海圖第1073號〈急水門至青衣門〉



〔圖4〕中國海圖第15-1041號（珠江口附近）中的南頭島（中國航海圖書出版社1981年版）

本文再予申述，並補充實圖二份。對於西方明示大濠島稱南頭島的古圖，亦提供一批實例。

一、在中國航海界稱為南頭島，迄今此名仍在應用，有航海圖籍可證。

我國航海保障部門繼承歷史航海地理知識，運用新的航海實踐經驗和設施及適應海況自然變遷情況而編寫

的，專供航海人士參考的航行指南書《中國航路指南》，就有多處介紹南頭島（大濠島）地名：“船舶可取道南頭（大濠島）北方，經急水門航道進入香港”，“急水門位於南頭（大濠島）東北端與馬灣島之間”，“南頭水道（大濠水道）：介於索罟列島、南頭島西南端與蚶洲列島、桂山島、中心洲、

牛頭島之間，最窄處寬約1.8里，水深12米以上，航道上無礙航物，是東來航船進入珠江口的捷徑”。“南頭（大濠島）島的雞翼角燈樁及大鴉洲燈樁都可供助航”。“香港西側主要有南頭（大濠）島……”，“香港外方有：果洲列島……南頭（大濠島）……這些島嶼都有不少良好錨地……”⁽⁴⁸⁾ 在介紹

屯門灣時也說：“屯門灣位於南頭島（大濠島）對岸的大陸邊，灣口介於……”⁽⁴⁹⁾以上引文中，括號內的夾注說明都是原文具有的。

同時，我國70-80年代出版的航海圖之一〈急水門至青衣門〉圖，在一個較大島上標有“南頭”，下面還注有“大濠島”三字。（見附圖3）⁽⁵⁰⁾在另外幾幅海圖上，則在該島上標明：“大濠島（南頭）”字樣的地名，如《珠江口附近圖》（見附圖4）⁽⁵¹⁾。這又從海圖上證明中國軍、政、商、漁、工程各界系統的航海者至今仍襲用南頭島地名。

在現代航海圖上的南頭島，其高峰標作“大嶼山”。⁽⁵²⁾在民用《中國航路指南》中也有介紹：“大嶼上（大濠峰）位於南頭（大濠島）的中部，為該島的最高峰。”⁽⁵³⁾說明在航海界祇把大嶼山當作南頭島（大濠島）中的一小部

分山體（山峰）看待，不過，前港英當局發行的《香港地圖》常把整個島標稱為“大嶼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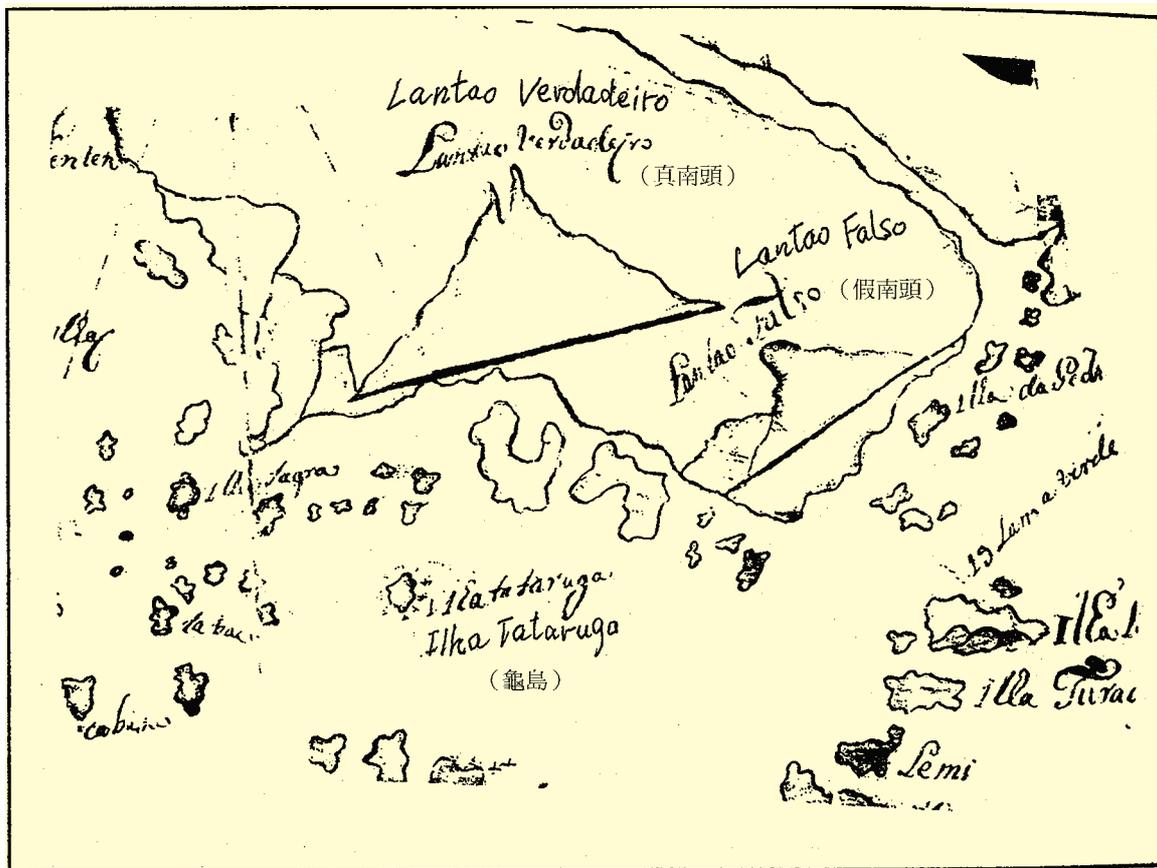
在上述〈珠江口附近〉海圖上，在該島西端與桂山島群島之間的水道，標稱“大濠水道”，與上述《航路指南》書中所說“南頭水道（大濠水道）”及《廣東省縣圖集》珠海·澳門圖所說“南頭水道”是一致的。⁽⁵³⁾

所以，筆者在70年代編寫的《中國水運地理詞典》，就曾注釋過南頭島與大濠島的關係：“大濠島又名南頭島，位於廣東省珠江口東側海中……”⁽⁵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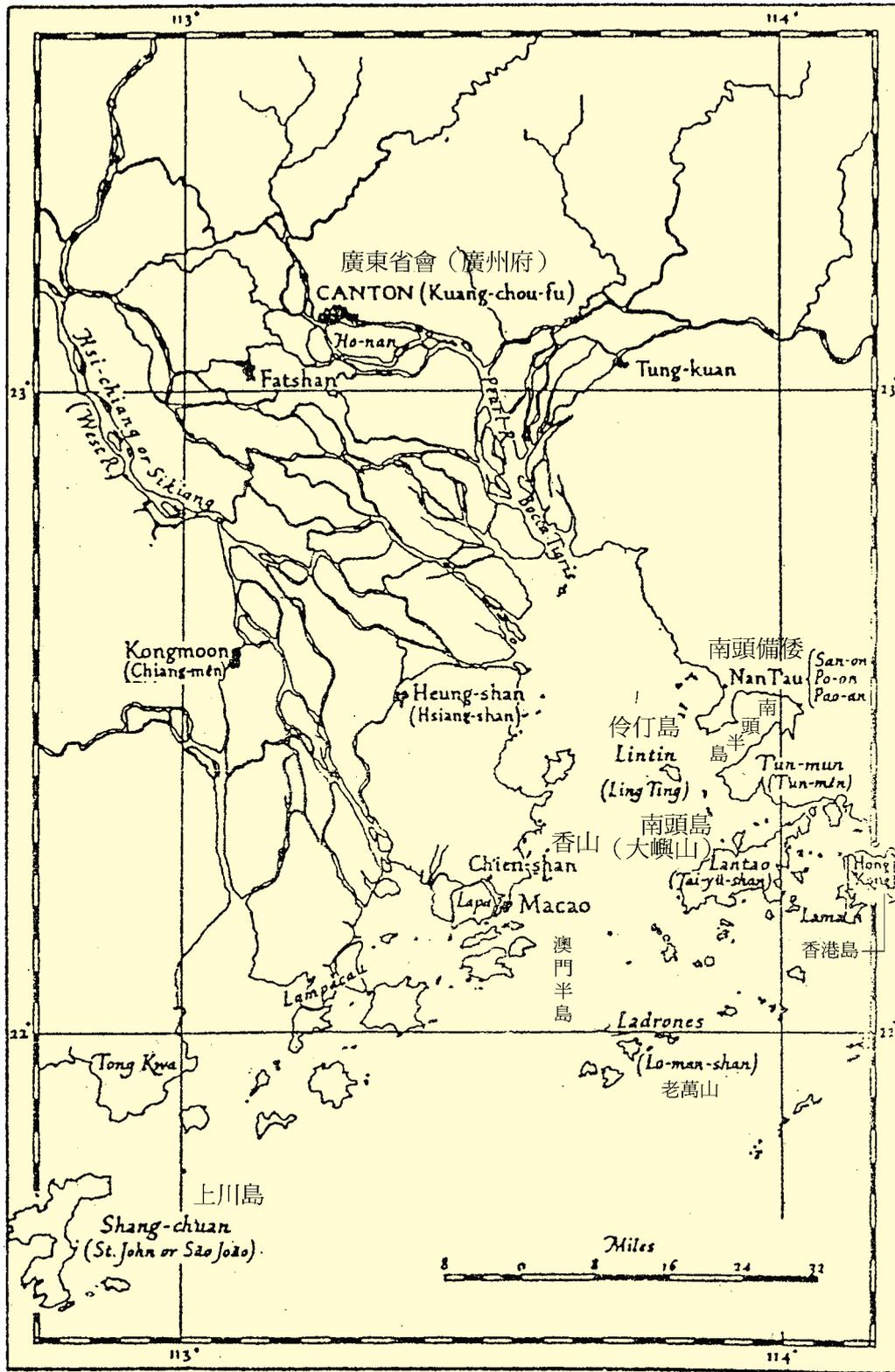
為甚麼又名南頭島？恐與明洪武二十七年起在東莞縣建南頭城作東莞千戶所所成、正德五年設備倭總兵署於南頭城的知名度相關，而大濠山又是在南頭總兵管轄之下，這都是在葡人首航來到南頭轄區之前已形成的地名格局。該島

是南頭總兵管轄下的最大海島，又處於進出廣州港航路要衝，其山峰最高，可為地文航海的天然物標，故航海家以“南頭”名島，亦不奇怪。儘管在正史上直接使用此名，含糊其詞，但在航海圖書中是直接明確的，在官員巡視記錄中也有提及。類似用“南頭”之名命名南頭島上小地名的情況在清代繼續有所反映。如該島東南部的大東山上，清代設有南頭營，但被後世和尚寫的《大嶼山志》音訛為“爛頭營”：“爛頭營在大東山，又名大洞山，副峰即爛頭營。”⁽⁵⁴⁾現在廣東地圖出版社出版的《香港旅遊圖》印有“爛頭營”⁽⁵⁵⁾，這是訛名，應還其歷史本來面目。

人們不應以正史上未有南頭島之名而拒絕承認其客觀存在。正如在明代正史中也未見有大嶼山之名而應予以承認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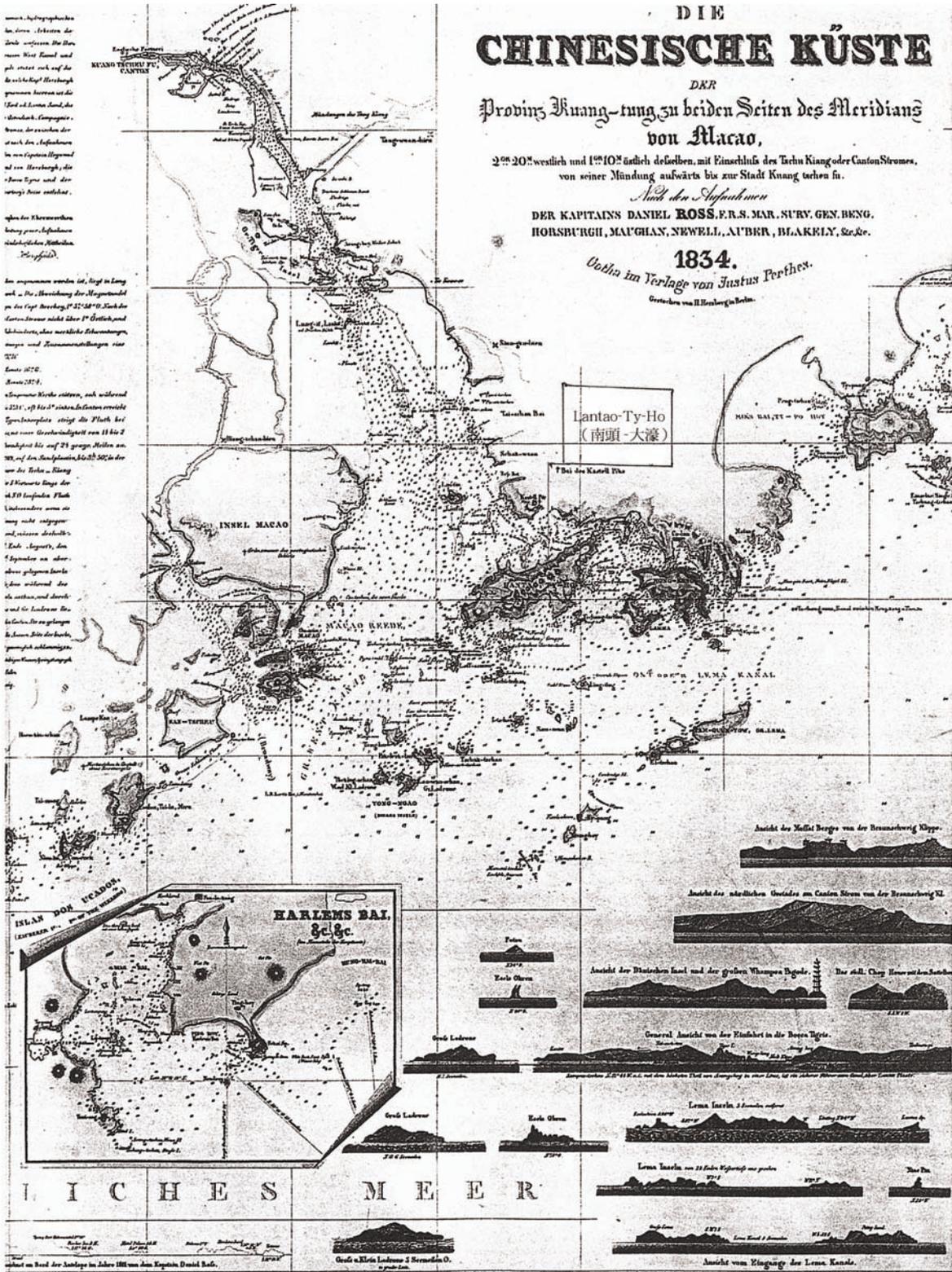
〔圖5〕里斯本國家圖書館D90R圖局部：1570年以前葡人繪製航海圖上的珠江口（手寫葡文和漢字係本文作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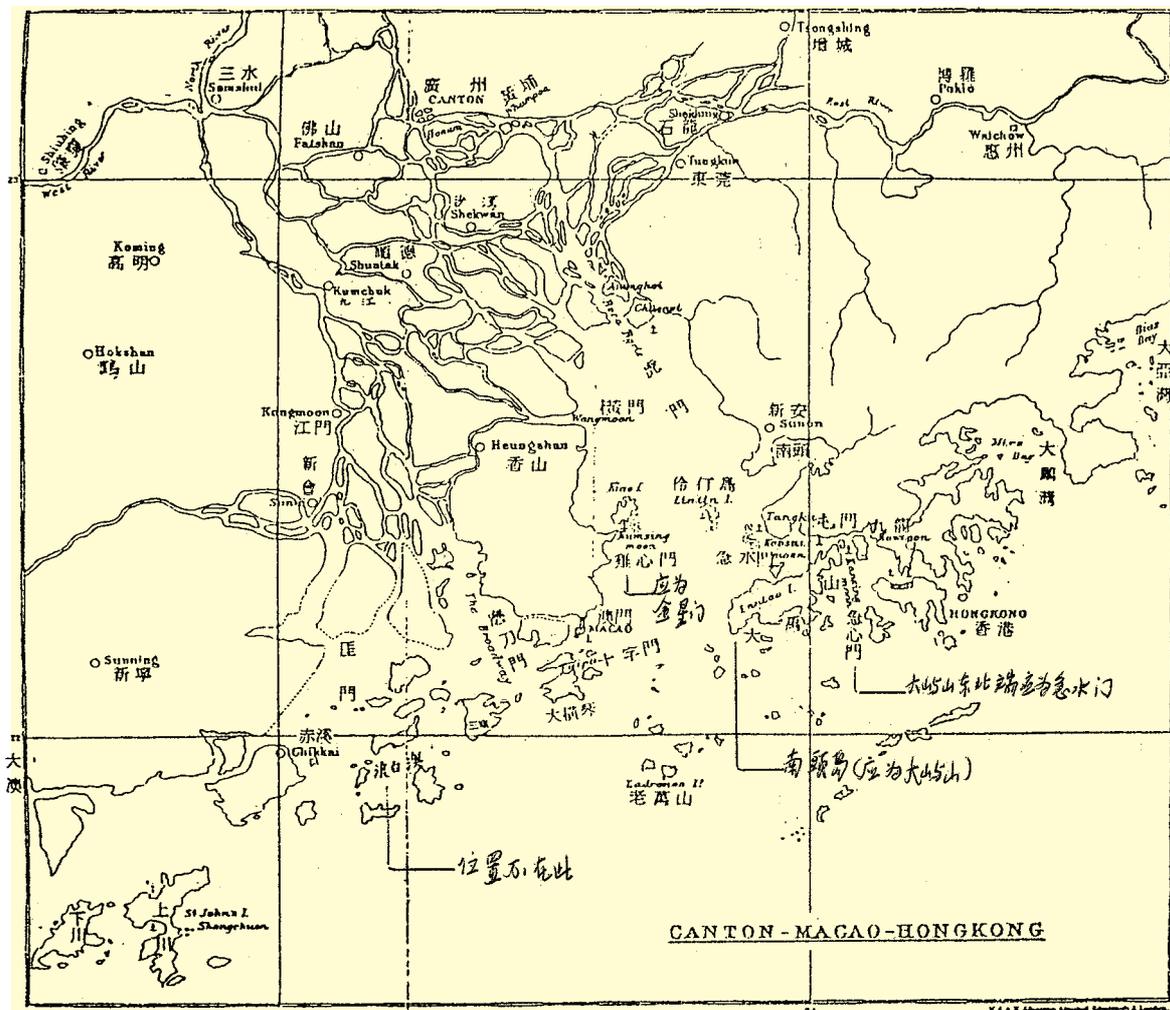
〔圖6〕珠江西江出海口圖：南頭半島和南頭島分佈 (The Pearl and the West River estuaries)
 底圖採自 C. 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xxxiv. 中文地名為本文筆者所加



〔圖 8〕1780 年海特船長繪製的《中國南海海圖》(Chart of China Sea by Capt. Hayter) Lantao 圖上標在澳門對海的南頭島上/原載哈爾·恩普森編《香港地圖繪製史》頁94 (香港政府新聞處1992年發行)



(圖9) 1934年德國人繪製的廣東省沿岸海圖 (German Chart of China Coast) 將 Lantao 島-Ty-Ho 島標在南頭(大濠)島上/原載澳門《歷代澳門航海圖》第四章頁101 (澳門海事博物館1996年再版)



〔圖10〕19世紀英人繪製的〈廣州、澳門、香港圖〉（中文地名為張增信先生原著所註，中文手寫體為筆者改正）

但我想這是金先生誤解此圖了。按南頭半島在澳門半島較遠的東北方，而此標有 Latao 的島，卻位於澳門半島的幾乎正東方，與今南頭島位置符合。又南頭半島南部無島嶼，而南頭島南部海中有萬山群島，而與該圖顯示的正好符合。

1780年即乾隆四十五年由海特船長繪製的〈中國南海海圖〉，在珠江口外東側，Macao 即澳門半島對岸的一大島即大濠島上，標有：Lantoe 字樣，也是意即“南頭”島。⁽⁶¹⁾（見附圖8）

清道光十四年即1834年，德國船長繪製的 Chinesische Kuste 即廣東沿岸海圖中部。香港島的西方，在一個大島

上標有 Lantao，同時標有 Ty-Ho 字樣，充分說明是島名南頭，又名大濠（見附圖9）。⁽⁶²⁾ 金先生在上述文中指拙文“所稱德國海圖為1834年所繪中國南每、澳門及沿海圖，查無南頭的字樣。”⁽⁶³⁾ 可能是金先生所看的圖印刷模糊，以致看不清標在島上的代表“南頭”的 Lantao 字樣吧。

19世紀英國 W & A. K. Johnston 繪製的廣州、澳門、香港圖中，在大嶼山島體上英文標的是 Tanta I，指的也是南頭島。張增信先生在〈16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貿易據點〉一文中附有此圖，並加注中文地名，遺憾的是

有些中文地名注得不確切，如對 Tanta I 注為“大禹山”，按19世紀通用“大嶼山”，“禹”乃諧音“嶼”的白字；“虎門”應標在口門，不應代替伶仃洋水域；“急水門”標寫位置不確；“急心門”無此地名；“浪白澳”標錯在南水島飲南與高欄島、大杜島之間了。⁽⁶⁴⁾ 本文冒昧予以更正而後用之（附圖10）。

據林天蔚稱，意大利傳教士於1866年（同治五年）繪製的〈新安縣圖〉，標有說明：“大嶼山（中大）Namtao, Called by Chinese Tai-U-Shan”⁽⁶⁵⁾，意謂：南頭，中國人也稱大嶼山。我認為這個 Namtao 拼法是對過去歐洲人不夠

準確拼法 Latao 或 Lantao 的糾正。無論 Lantao 或 Namtao 無疑都是從航海地名“南頭”島音譯過去的。而不是像林先生論析的：與中文名無關，且源於“浪白”。

總之，從 16 世紀到 19 世紀的西人地圖都反映有“南頭”島名。決非有人所謂清代才有。

那麼為甚麼有的圖書上對大嶼山即大濠島並不稱“南頭島”而稱“爛頭島”呢？

香港前英政府官定大濠島的中文名為“大嶼山”，這符合英佔之前中國所取的原名。其對應的英文地名也是 Lan Tao Is. 在他們出版的郊區地圖上注“俗稱爛頭山”，這不確。近代和尚明慧寫的《大嶼山志》解說“英文譯意為爛頭島”更不確，應為音譯。香港沈思在前述文章還解說：“爛頭山是因在珠江口西岸觀看，尤其是在伶仃洋、澳門、桂山群島、索罟群島與外伶仃島一帶觀看，島上最突出的是高 933 米的鳳凰山，‘雙峰插霄，形如鳳閣’。在當地群眾看來，‘雙峰插霄’其實就是‘崩爛破頭’，故此鳳凰山被人俗稱為爛頭山，音譯為 Lan-Tan”。這一說法實難讓人接受。南頭島並非荒涼破爛的山島，自然景觀較好，被現代旅遊業看好，投資建遊樂場，就是主峰鳳凰山，在古代也因其景觀佳麗，才給它起了個最好聽而高貴的峰名“鳳凰山”，並把此景點稱為“雙峰插霄”，當地群眾怎麼會把它看作並稱作“爛頭山”？“爛頭”真正來源，是當初有人把“南頭”音訛，拼成 Lan Tan，想當然地音譯為“爛頭島”，再加不確切解說，傳播日久，也就以訛為真了。另外，上述臺灣林天蔚先生文中解說為由於大嶼山東南有大浪灣，所以“所謂爛頭者，粵音‘浪頭’（俗稱大浪為浪頭）”。最後竟附會成“浪白”即“浪白島”，越發離譜了。總之，此兩種解說都不能成立。它是出於中國的原有地名之一“南頭島”。

“南頭島”所以會變成“爛頭島”恐與外文返譯有關。據說粵語中“南”與“爛”發音易混。且葡人在記錄中國沿海地名中，就常見以 L 代 N 現象，如記閩粵交界處南澳島，第一字母就未用 N 而用 L，拼作 Lamho、Lamao 代表南澳。(66)

愚見並不孤立。查得香港大學饒宗頤先生《港·九前代考古雜錄》一文也持類似觀點。該文說：“今西人稱大嶼山曰 Lantaw Island。近代僧明慧著《大嶼山志》謂‘英文譯意為爛頭島’。余則疑其與南頭有關，恐是譯音，而非譯意也。”批駁了和尚明慧的妄說。(67)又說：“後世南頭音訛為‘爛頭’，‘大

嶼山所以有‘爛頭’之名，疑因明時南頭設寨，其地即古之屯門鎮，大嶼山周圍皆在其控制之內。清於大嶼山設炮臺，駐汛兵於此，遂得蒙爛頭營之稱，‘爛頭’其即舊時南頭之音訛乎？”(68)我除同意此說外，要補充的是：該島本來也稱南頭島。

3) 對前文所稱 1552 年葡人海圖存疑。

我在《文化雜誌》發表〈屯門島〉文後第三年，經過補充修訂，寫成〈葡萄牙人在廣東活動地 Is, Tamao 應為我國何島？〉一文給《海交史研究》。其中舉“澳門海事署編的《歷代澳門航海圖》



〔圖 11〕澳門海事署編《歷代澳門航海圖》第二章（漢字係本文作者所加）

第二章就載有葡萄牙航海家於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繪製記載於大嶼島上的地名為Lan-Tan，並注明轉引自載於《中國地名考證文集》上的沈思〈大嶼山地名的考證〉。⁽⁶⁹⁾2000年，金國平先生〈中西輿圖上的Tantao與香港〉一文說：“施存龍自稱未見此圖，轉引自沈思〈大嶼山地名的考證〉一文。《歷代澳門航海圖》的說明以葡中雙語撰寫。有關文字如下：‘也許於1552年至1562年所繪製的，……’。施存龍去掉了‘也許’二字。此圖由潘日明神甫提供，無繪製日期，圖例以英語標示。由三幅小圖：1）廣州；2）上川島；3）澳門及其附近島嶼組成。從兩項基本史實出發，可證此圖絕不可能作於1552-1563年間，首先，早期葡人繪製的中國沿海圖中至今未見以英語製作的版本。其次，廣州圖中將內城標為Tartar City，將外城標為Chinese City。這足以說明此圖的製作年代當在入清之後。還要糾正的是‘Lan-tan or the Magpies’這一圖例標示在屯門半島，而不是大嶼島上。”⁽⁷⁰⁾

當時我未能見原圖，所轉引沈思文章也未附圖，且無圖例和標示語種的說明。如果該圖確如金先生所說那樣，我應撤消所謂製於1512年說法。不過順便要說明的是，我沒有擅自“去掉了‘也許’兩字”。因為我所轉引的沈思文上根本沒有金先生提供的帶“也許”這段話，祇是說“最早的一幅是1552年葡人所繪。圖中的大嶼山稱Lan-Tan。這是目前資料所見最早的外文紀錄”⁽⁷¹⁾。在外國艦隊繪製的海圖上，大嶼山的記載如下：“1552年，Lan-Tan or The Magpies。”⁽⁷²⁾我是忠實引證了沈文，可惜沈文未能如實引證他所引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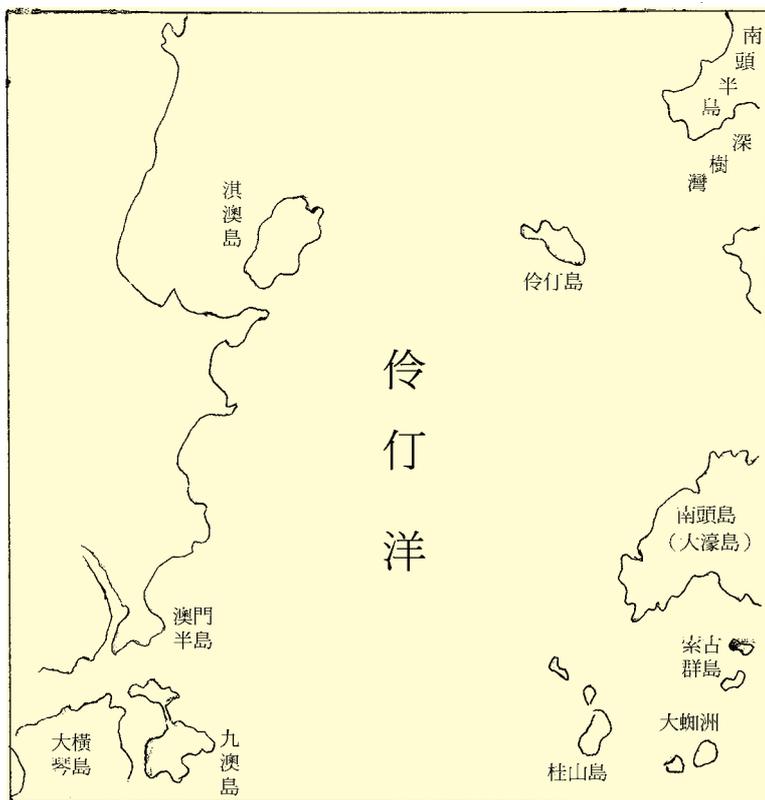
我現在有機會看到澳門海事署《歷代澳門航海圖》第二章Ma-Kao & The Adjacent Isles圖，確實如金所說圖名的地名用英文（附圖11），不符16世紀葡人不用葡文的習慣。但我還不

能馬上也肯定它是“入清之後”才製作的圖。還有疑點未解：第一，此圖提供人潘日明神甫對此圖製作年代是如何判斷的？他是否認為是明代的？否則為何默許標作“也許於1552年至1563年所繪製”？第二，航海署編此圖冊時，面對用英語的該圖，為何不認為是清代，卻判斷為“也許於1552年至1563年所繪製”，不能說就是毫無依據就信口開河的吧？我推測是否那個時期葡人繪製的圖為使用英語者翻版？究竟如何有待原編者回答背景。

據我在2003年11月在澳門期間詢問，得悉提供該圖的潘日明神甫已去世，再也無法向他本人瞭解。編此圖集的葡人也已返本國，祇能待今後有機會再問。不過在圖集文字說明中，編者思路已有透露，即使不詢問編者，也可明

白。《當代澳門航海圖》第二章完整的說明是：“由三個圖拼接而成的鑲嵌圖，至於其來源已沒有資料了，它分別代表了廣州及其資料不詳的河流，聖方濟各墳地所在地的San Choào島，澳門及鄰近島嶼：大嶼山及現在路環等等島嶼。由於聖方濟各於1552逝世，如此可估計此項工作係於16世紀中葉末期，也許於1552至1563年所繪製的，葡國人集中在這段期間內來澳，結果在1557年定居於澳門。這三個圖尤其是SanChoào及澳門的兩個圖，基本上是航海圖，因裡面所載的資料，主要涉及了水文情況，圖內數字係代表了水深，倒畫的小錨則代表船隻經常使用停泊處。（由潘日明神父讓出之複製品）”

從中間一段話，可以看出編者作出該圖“也許於1552年至1563年所繪製”



〔圖12〕南頭島、南頭半島與澳門半島相對位置圖
（此據廣東省航道局1983年8月版珠江三角洲航道圖為底圖，很顯然，澳門東部的大島是南頭島而非南頭半島）

推論的依據是由於拼成三幅中，有一幅是有傳教士沙勿略神父墓地的上川島，而他是1552年在上川島去世的。但是僅憑這點不足以認定。所以編者冠以“也許”。我們要指出：退一步論，若該圖並非繪製於1552-1563年，少了一件旁證，也並不影響葡人來華早期就對大濠島稱Lantan島的事實。因為還有前述其它證據，從而無妨在整體上對是南頭島的肯定。

至於金先生所說：“還要糾正的是，‘Lantan or the Maqphies’這一圖例標示在屯門半島，而不是大濠島上”⁽⁷³⁾，我覺得這一“糾正”需要糾正。這“Lan-tan or the Maqpies”是標示在大濠島上而不是在南頭半島上（金文作“屯門半島”。誤，非此地名）。道理很簡單，第一，南頭半島在伶仃島（圖上所標Lin-tin）東北方，圖上沒有也無從顯示，而所謂的“屯門半島”，在伶仃半島的正東，它向東縮，在該圖上也不可能表示出來。圖上這個表現出來位居伶仃島之南、澳門半島之東的，唯一可能的是大濠島，捨此無它。而且還有旁證的是：它的南側小島群，雖未標名，一望便知是桂山島、索古群島、大小蚬洲。對照現代地圖便可知曉（見附圖12）。如果它是南頭半島或所謂“屯門半島”，豈非該兩半島從伶仃島東北和東，搬到伶仃島之南了嗎？所以定是誤察了。

關於金國平先生介紹的兩則西方早期文獻中Lamtao的文字記載，我判斷：都應指南頭島。

第一則，《葡萄牙影像資料館刊》第2期頁73上所說：“另一證人發誓說，他曾聽說聖人方濟各神甫曾至中國的島嶼Lantao。”⁽⁷⁴⁾按這位住在上川島千方百計買通船想偷渡到中國大陸未能成功的傳教士沙勿略，他不可能潛入到海防要地南頭半島去自我暴露的，而到他們先驅佔據過而被驅逐的老據點南頭島懷舊和憑弔首航者阿爾瓦雷斯父子墓地和豎過的“發現中國”紀念石碑則是可能的。

第二則所說1584年，意籍來華著名傳教士利瑪竇在一信中稱：“距（澳門）城不遠處有一名叫Lintao的島嶼……”⁽⁷⁵⁾Lintao與Lantao，祇是一個字母拼法之異，意語與葡語兩語種這點微小差別不足為怪。既然明言是一島嶼，則不會是指南頭半島。南頭半島與澳門半島之間確實不遠，就在其所居地澳門東西不遠海域，比南頭半島距澳門近。

南頭島可能作過葡人據點的參考旁證

一、從考古出土文物可證南頭島在明代有外貿。

湯開建先生曾在〈中葡關係的起點：上、下川島——Tamão新考〉一文中，對林天蔚先生〈16世紀葡萄牙人在香港事跡考〉一文主張“屯門島”即大嶼山，提出批駁，其理由之一是：“在明代，大嶼山亦未有任何文獻材料可證明這裡是外國商船大規模走私的場所，根本無法稱之為：‘貿易之島’。”⁽⁷⁶⁾湯文所說的“貿易之島”也就是林文所說的“屯門島”。湯文所說大嶼山不是大規模走私的場所，可能說對，但初期來華葡商走私貿易本來就談不上是“大規模”。沒有大規模，中小規模還是有的，這從下述可知。又，沒有任何文獻記載大嶼山有走私貿易，這一提法也是對的。但文獻沒記載，不等於實際沒有，當代考古發現已可證明。

在珠海市研討嶺南海洋文化中得知：“大嶼山竹篙灣曾出土大批明代中早期的景德鎮青花瓶、碗、青花玉壺青花瓶、白釉暗花盤，和龍泉窰豆青大盤等精靈瓷片。”⁽⁷⁷⁾《香港文物》稱“竹篙灣發掘時，發現一個填有明代外銷瓷片的大坑。顯示瓷片是被人故意棄置。”“大嶼山竹篙灣遺址出土的精美明代青花外銷瓷片。”⁽⁷⁸⁾由此已可初步證明明代曾是外貿走私之島嶼。竹篙島不過是大嶼山一小港灣，港灣

著名度很低，那些著名度高、港灣較好、容量較大的如大澳、二澳、東涌等地地下也許有更多能證明明代有過外貿活動的文物埋藏着。我相信隨着該島沿岸的開發利用，將來會有更多文物出土。

二、從西草灣中葡戰後亡羊補牢加強南頭島海防看，意在防範葡人重返。這就是設立南頭水寨，並分設六個巡防前哨（汛），其中大澳、浪淘灣兩汛，就在南頭島上大澳和沙螺灣或東涌。

三、從後代明清政府讓西方商船停泊到大嶼山從事外貿活動返觀。

1635年12月（明崇禎八年），英王查理一世授權海軍上將約翰·威德爾（John Weddell）率領武裝商船四艘到廣東通商，事先英王佈署他如有合適有利的地方，代他佔領。次年4月離英，1637年6月駛抵葡租中國港口澳門，企圖進一步駛往廣州府城內港。明政府令英船隊到大嶼山港灣傍泊（因係英國第一次正式派武裝商船來華，明朝對其不瞭解。後該船隊武力發炮並侵佔珠江口亞娘鞋炮臺，強駛到廣州）。⁽⁷⁹⁾這是明政府讓歐洲商船利用大嶼山一例。

明代荷蘭人奪取澳門的嘗試失敗，但並不放棄有利的對華貿易。轉而侵佔臺灣又被明末鄭成功趕出，為了復仇和討好反鄭的清政權，曾協助清兵進剿臺灣鄭氏政權。作為回報，清政權允許荷商船到廣州卸貨貿易，完後讓其停泊和暫住在在大嶼山大澳附近一港灣，作為修船、候季風、過冬之地。後得寸進尺，建起堡壘盤踞，廣東民間便稱該港灣為“番鬼塘”⁽⁸⁰⁾。此乃清初讓歐洲人利用大嶼山實例。在荷人之前，是否曾為葡人盤踞，也未可知。

兩例說明一個問題，明清政府每當西方海上霸王到珠江口，既不能拒絕又不願其進入廣州內港和外港（黃埔或屯門島）時，主動令他們去那個可緩衝的南頭島（大嶼山）去。

四、從後來英商船自停南頭島貿易和擬佔以及實佔南頭島返觀。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正當清廷計劃開放海禁之際，“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卡羅萊娜（Carolina）曾到大嶼山貿易，在該地停泊兩月之久。⁽⁸¹⁾ 1689年，英商船“保衛”號（Defence）停泊在“澳門以東約15海里”處，近代美國人馬士推測停留在香港島西急水門。⁽⁸²⁾ 我認為從這一渥程考慮，大嶼山合適，況有1683年前例的經驗。

“18世紀後期，英國殖民者在奪取檳榔嶼的同時，據說曾有佔領大嶼山的圖謀。”⁽⁸³⁾

1836年1月，英駐華商務總監督羅賓遜（G. B. Robinson）從伶仃洋致信外交大臣巴麥尊，建議佔領一島嶼作商業用，很可能指大嶼山或香港島，因他在上年4月就曾建議把全體在華英商都轉移到“大嶼山或香港附近的一些美麗的海港去”，在那裡建立據點。⁽⁸⁴⁾

1940年12月，英國的印度總督奧克蘭（鴉片戰爭中，英軍主要由他派遣，軍費亦由他籌措，故對侵華行動有發言指導權）致信英國駐華商務監督懿律、義律和侵華軍司令伯麥的信中“要求佔領大嶼山或香港”⁽⁸⁵⁾。

1841年1月24日，英艦“琉璜”號（Sulphur）奉伯麥之令，當天從大嶼山西南部港口駛向香港島，實行佔領。⁽⁸⁶⁾ 由此透露出英艦還以大嶼山港灣作為海軍據點。

以上英商和英軍從17世紀到19世紀的三個世紀內都曾選取南頭島為走私貿易和停泊軍艦的據點。這很可能與16世紀葡人曾以該點為活動據點有關。

五、從清代大規模海盜集團以南頭島作根據地事例返觀。

清嘉慶時，珠江口形成以張保仔一鄭一嫂為首的大型海盜集團，有盜眾數千人，連同隨從家屬在內達兩萬多人，大小武裝帆船在千艘以上。他們選擇南頭島（大嶼山）為根據地（《香港沿革史》稱以香港島為其基地，係傳說，不可信。因香港島較小，離大陸太近，又駐有官兵），主要據點為東涌，設修造船

廠，供應給養基地。張的武裝船隊與清官兵——水師和葡萄牙在澳門艦隊組成的聯合艦隊大戰九天，戰地就在該島的赤鱲角。竟不能打敗張軍。⁽⁸⁷⁾ 該島適於張保仔作根據地，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說明地理條件適合葡人作據點。

大嶼山說雖為殊途同歸 但缺乏針對證據

一、今人林天蔚先生在〈16世紀葡萄牙人在香港事蹟考〉文中有“屯門島（澳）即大嶼山考”一節稱：“當日葡人所到達的 Tamao，實在應是今日香港對海的大嶼山 Lantau Island。”理由呢？其一，因歷史上的記載，屯門是一海島，而今日的屯門與南頭〔施按：此指南頭半島〕相連，有兵防守，不可能由葡人佔領。葡人善於航海，當日之大嶼山為一荒島，但港灣優良，位於珠江三角洲口，形勢險要，葡人自然不會放棄。⁽⁸⁸⁾ 此論有對有錯：對的是屯門不可能由葡人佔領；不對的是，當日之大嶼山並不是一座荒島，且說上古新石器時代已有先民生產生活，就說宋代已有漁鹽為業的群體居住。從明代《粵大記》圖示，更有明確的村莊記錄：如梅窠村、螺盃澳、塘塢、石壁、大澳、沙螺灣、東西涌等村莊，也許因位置有限，村名尚未全列上。大澳、沙螺灣旁還繪有船舶，以示為港埠所在。可見，在葡人到珠江口時，該島已經有人們開發利用的歷史，並且在繼續開發利用，所以稱荒島不妥。其二，說“葡人東來，志在入廣州與中國貿易。那麼先據在珠江三角洲口外找一島停泊，覓機北上廣州，最為合理。……葡人阿爾華烈士（Jorge Álvares）到達中國的‘屯門島’（大嶼山）較為合理。……正德十一年，葡人已佔領屯門島。”⁽⁸⁹⁾ 此見解亦在理。但這不起決定性作用，祇是合理的推論，有此可能，但可能不等於事實。何況，珠江口外島嶼林立，合乎這一條件的，並非祇此大嶼山一個島，還

可有別的選擇，同樣可達到葡人東來中國並北上廣州的意圖。而其三之理由稱有兩個屯門澳：一個是在大陸與南頭寨切近的屯門澳即今九龍的青山灣；另一個是海島“屯門澳”。他說：“又有‘屯門島’，據應櫛之《蒼梧總督軍門志》卷五與圖三南頭寨，便清楚顯出另一‘屯門澳’便立於海中。西有老萬山（萬山群島），東有伶仃洋（應在南方），西南為南頭寨（南頭應在北方），旁有注：‘此澳大，可泊東南風，至老萬山二潮水……’若以位置對照，此‘屯門澳’顯然是今日香港的大嶼山，與屯門（青山灣）遙遙相對。”⁽⁹⁰⁾ 並把王崇熙《新安縣志》卷十三〇寇盜中所說“番夷佛郎機入寇，佔據屯門海澳”中的“屯門海澳”直接注解為“（應是屯門島）”。再把“屯門島”注成大嶼山。對於林說這條理由，李德超先生大不以為然：“余按該圖，乃古式繪法，即南在上而北在下，東在左而西在右，與清以後之繪法為不同。林氏以圖中之屯門澳即為今之大嶼山，亦即當日葡人所到之 Tamão 島。惟大嶼山應在磨刀與急水門之間，與圖中所寫屯門澳之位置不符，且圖中屯門澳三字附近，又未繪島嶼圖樣。意其所以將屯門澳三字寫於海中者，乃其下有注……四十二字，致無位置耳。”⁽⁹¹⁾ 這就是說，《軍門志》該圖“屯門澳”說明詞內容過長，圖上的陸地上難以安排得下，所以將地名及其說明詞安排在相當於大嶼山位置。不能因此誤認這是另一個屯門澳並代表着大嶼山。這一見解頗有道理，使林先生此一理由發生動搖（林這一誤解，筆者自己也犯過，還曾表述在文章中，後來發覺改正，如前述）。林文為了自圓其說，在注二八中，對於《軍門志》海中屯門澳與《粵大記》大陸屯門澳矛盾作了如下解釋：“《粵大記》大陸三十二〈海防圖〉指出‘屯門’位於大陸，……對海之島（大嶼山）雖有梅窠、東西涌、大嶼山之名，但並不稱屯門。當然，島上有不少優良港灣，且屬‘屯門’管轄範



〔圖13〕東印度航海圖（林旭登航海圖）原 1595 年版

圍之內，故應標誤為‘屯門澳’。(92)但這亦無濟於事。林文其四理由是把大嶼山東南部有大浪灣，“大浪”谷稱“浪頭”、“爛頭”島名英語 Lantau 疑是由此“浪頭”的粵音而來。(73)

我認為這種推測 Lantau 地名淵源難以成理。第一，“大浪灣”的“大浪”推論為俗稱的粵音“浪頭”，又把“浪頭”諧音成“爛頭”，一轉手之間成為西名 Lantau 的名源，這種演繹方法實乏說服力。第二，即使我們退一步勉強接受，也因該“大浪灣”未見明代記載，乃是後世出現的地名。按他自己說的，等效的“浪白”地名也是“即清之浪白”，怎麼能成為二百多年前明代正德時地名依據呢？第三，“爛頭”實為“南頭”之訛，而且此訛清代中後期才開始，怎能成為葡人初來時的地名呢？第四，他說“按外人初至我國，對於未名之島嶼，詢之於當地人民。而當地人民多是知識低下漁民與鹽民，對此等未名之島嶼，往往以即景而付之新名”。這不切合實際，該島並非未名的島。

林文除以上幾條理由都難成立外，其要害還在於沒有提出一點明代史料涉及葡人在稱為大嶼山地名有關的活動情況所記載的直接證據。該文在引述宋、明史料均稱大嶼山後稱：“至於大嶼山之名，是始自清。據王崇熙《新安縣志》卷四山水：‘大嶼山，一名大嶼山，在縣南百餘里’。可知清以前祇稱‘大嶼山’，至清則雜稱‘大嶼山’與‘大嶼山’。”(94)入門要問：既然按該文強調認定的大嶼山名在明代尚未出現，直到清中後期的嘉慶時才出現，怎麼可以說明正德時初來廣東的佛郎機人就是以大嶼山為活動據點，佛郎機人所記載的 Ilha Tamao 屯門島就是大嶼山呢？也許作者會辯解說：大嶼山明代叫大嶼嗎？這是用今名說故事的。大嶼山是否等於大嶼山，有待商榷（筆者另有專文）。作者還說“中國典籍上稱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均是一音之

轉。”(95)稱大嶼山與大嶼山乃兩者一音之轉，尚說得過去（按大嶼山之名也是清代才出現而非明正德時已有），而“奚”字就算按舊讀為 Xù 而勉強說通，那麼兩者字義相差甚遠也難相通。我們暫且退一步而論，就算今大嶼山即明大嶼山，那麼，為何作者提不出明代史料中有一直接或間接說佛郎機人在大嶼山活動的話呢？我們也未發現在一切可見的明代史料有佛郎機人在大嶼山活動的記載，所能看到的卻比比皆是“退泊南頭”，“治馭脫南頭”，或者“雜湊屯門”等。而16世紀的葡方文獻，就現在所披露的傳到中國史料，也都未發現有與“大嶼山”對音或合意的音譯或意譯名。所見的也都是 Lantao 等對音南頭的島名。

然而，林文雖有以上欠缺，但他歸宿於大嶼山還是對的，不可抹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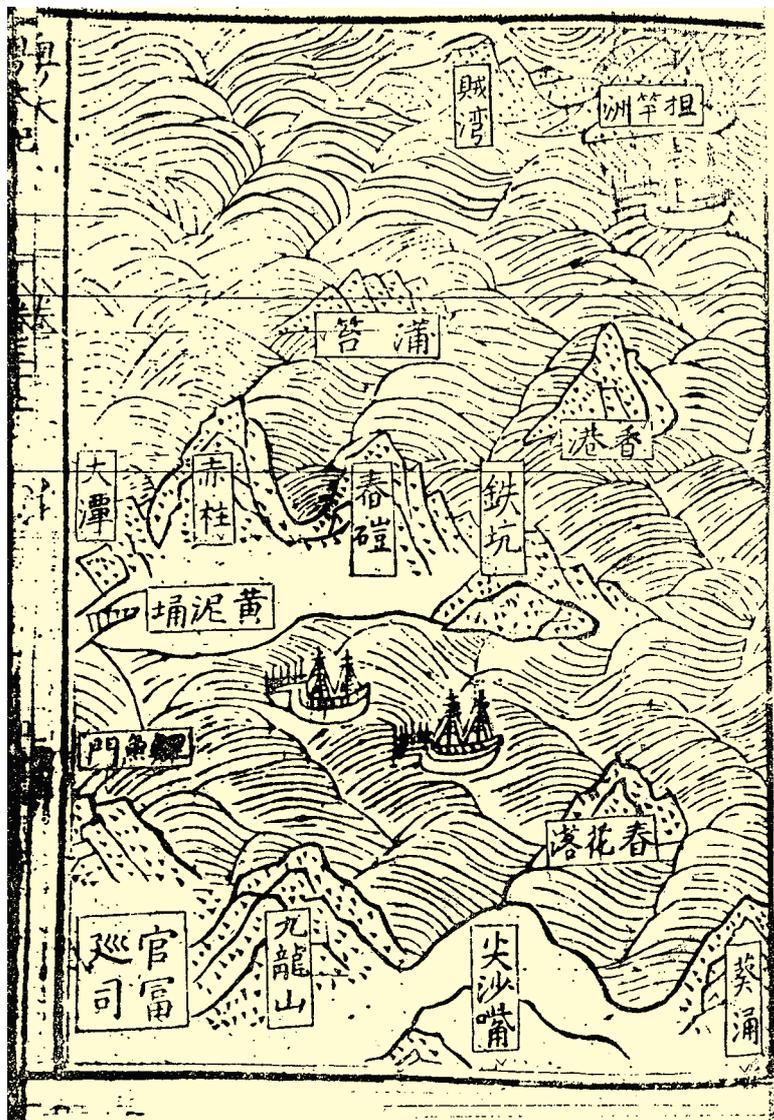
二、金國平大嶼山說長處與短缺

葡文翻譯家兼澳門史研究者金國平先生，原傾向初來葡人所泊港口的島“可能為大門島”(96)，在評論拙文南頭島說後，接過上述林的大嶼山說，並將此說向前推進、深入，一方面避免了林文借《軍門志》將“屯門澳”寫在海中附會為大嶼山等缺陷，另一方面運用葡語文獻論證長處。他在《Tumon 雜考》說：“首先，在1512年圖上，我們還可以看到從右數第二個島嶼下有如下圖例：‘前往中國的平底帆船停泊此島’。此與王崇熙《新安縣志》‘屯門舊為番舶所泊’的記述完全吻合……歐維士〔施按：即林天蔚文中所譯的阿爾華烈士〕初抵之地當為所謂的 Tomun 島。其他無疑應為今大嶼山。第一個白色的島嶼，應為香港島”。(97)又重複強調：“在著名的林旭登航海圖上，我們可以看到在1512年圖上右，邊第二個黑色的島嶼被明確地標示為 J Veniaga(貿易島)，而左邊的那個白色島嶼的圖例為 Pulo Cao(狗島)。”接着注解說：“這可能是香港最早的外文名字。”(98)即認為香港島葡人稱其為

“狗島”。(附圖13)但同文中又稱“在度藏里斯本國立圖書館的一幅繪製於1574年以前的航海圖中，……相當於今香港的島嶼被注為 Ilha Tartaruga 意為龜島（其下接着有個注解(5)，重複強調‘意即龜島’），不見漢籍輿圖有此稱，但其附近有獨龜洋、鰲灣，葡語可能由此借名。”(99)即解說為“龜島”又解說為“狗島”，互相矛盾，令人難以適從。若按龜島論，也並非“不見漢籍”，漢籍航海至今仍有：“香港東側諸錨地，海圖10719、10720。香港東側的佛頭角至大鵬灣西側的大浪嘴之間，有一深水海灣，……灣內的主要島嶼有龜島、吊鐘洲（毡島）、晾船灣洲（高島）、崎嶇島、里磁島及果洲列島”。(100)由此可見它不是香港島在明代葡人筆下的古名（“香港島”之名，已見明代史籍《粵大記》，見附圖14）。所以，以該圖中“龜島”等於香港島為參照物而推論出其旁為大嶼山的說法，還不能令人放心。

若按“狗島”即香港而論，他解說理由是“用家畜，動物命名地名是葡萄牙人在海外大發現時期常用命名法之一。”不過沒有解說為甚麼會用狗而不用別的家畜命名香港島，更沒有解說1512年，葡人還未來到中國廣東，這張圖不過是“從一爪哇地圖臨摹”過來的，臨摹人羅德里格斯祇能將爪哇語中國地名譯成葡文，怎麼會臨時隨便命名為“狗島”呢？還有該貿易島和龜島的形狀特別是處於珠江口外海岸的位置離實際太遠，也令人不能放心地接受。

金文所引證的，除了引證的依據本身存在不確或置疑外，歸根到底還是從葡人古圖中間接推論，缺乏直接記錄大嶼山或大嶼山地名及葡人在大嶼山上活動的葡文史料，也未提出任何明代中文獻中有關佛郎機人在叫做“大嶼山”上活動的史料，連對大嶼山地名淵源也未考證，所列中國文獻都是“退泊南頭”的話。就連作為參照物的“狗島”也未說清楚，如今天的香港島在明代已有



〔圖14〕明代已有“香港”島名

“香港”之名，出現在前述《粵大記》上，儘管《粵大記》成書遲於葡人初來時，但實際應用必早在寫進地名志裡，為何葡人不用“香港”或其它代表香港的中國地名而擅起“狗島”之名呢？

金先生在〈中西輿圖上的 Lantao 與香港〉一文除了重複上文論屯門島是大嶼山同一內容外，有些新補充。主要有：認為林旭登書所載針路中所稱的大島可能是大嶼山。⁽¹⁰¹⁾“早期葡語文獻以 Lantao 稱今香港屯門、九龍一帶陸

地，後又以稱大嶼山，同時使用其同源異名 Nantao”⁽¹⁰²⁾。然而無論 Lantao 或 Nantao，都不能與大嶼山諧音，而與南頭島正好諧音而又符合辭源。

該文認為至今藏在葡國圖書館的 D90R 圖手稿所說的 Nantao 為屯門半島，Nanto 為南頭半島。疑問同樣是：既然初來葡人據大嶼山或大奚山為基地，為何在他們公私文獻中從未記他們始到地和初期活動包括豎紀念柱，埋阿爾華雷斯父子、建軍事堡壘、走私貿

易、奴役居民等等所在島名為大嶼山或大奚山的譯名呢？歷史家記的卻是 Ilha da Veniaga (貿易島) 和 Ilha Tamao (屯門島)，稍後航海家繪的卻是 Lantan (南頭島)。

當然，兩篇金文雖然存在不足，但對開展這一問題的深入討論，是有益的，提供前人未提及的葡國歷史圖書，是有貢獻的。希望能繼續發揮自身長處和方便條件，發掘葡國或第三國的有關資料，使問題解決得更圓滿更徹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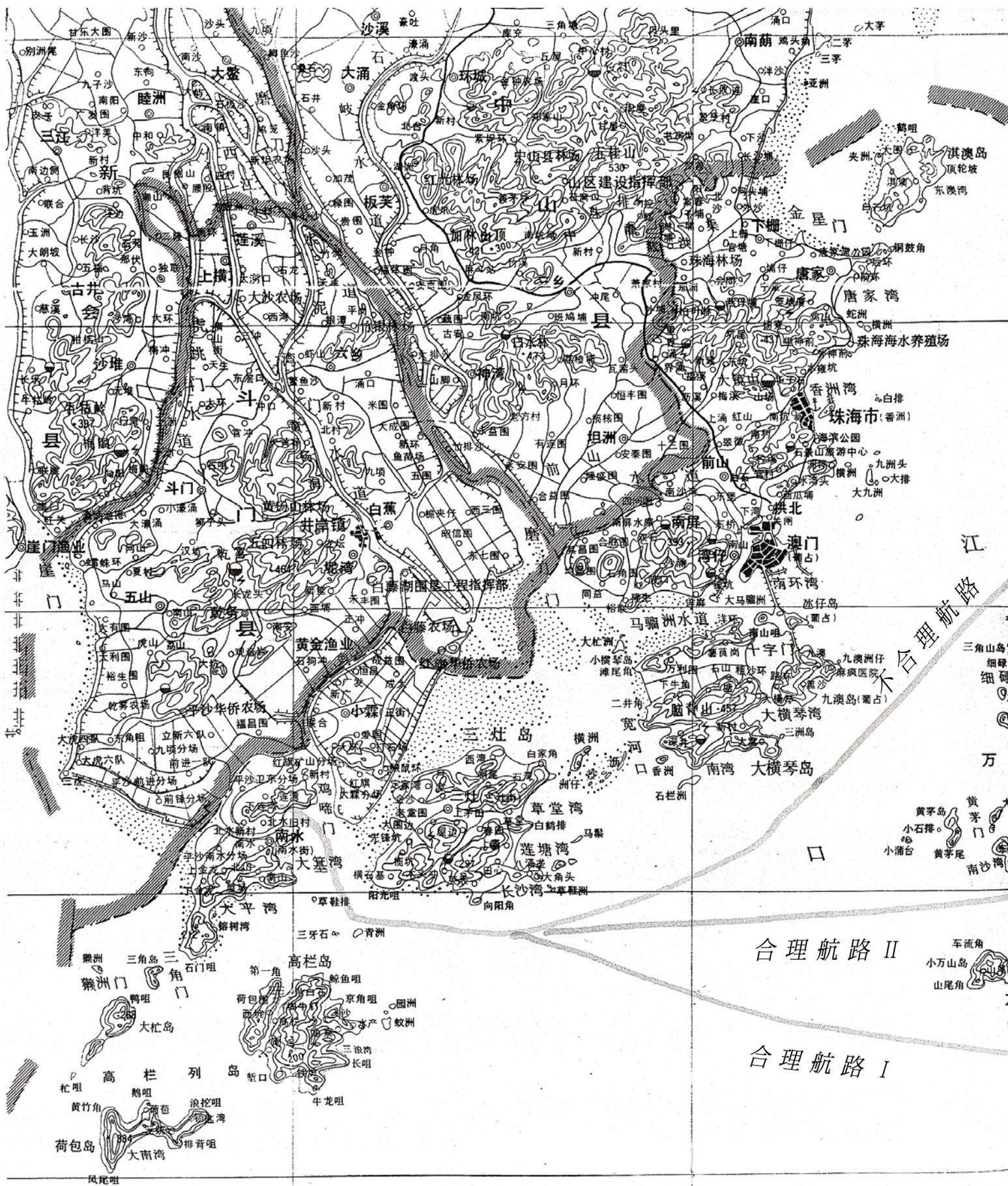
大嶼山說與南頭島說，可以說是異途同歸，最後歸宿的地望是同一個，所以沒有原則上的分歧，祇是在若干具體問題上不同，經過切磋，是可望取得共識的。

補論 Tamon 島 等於“東涌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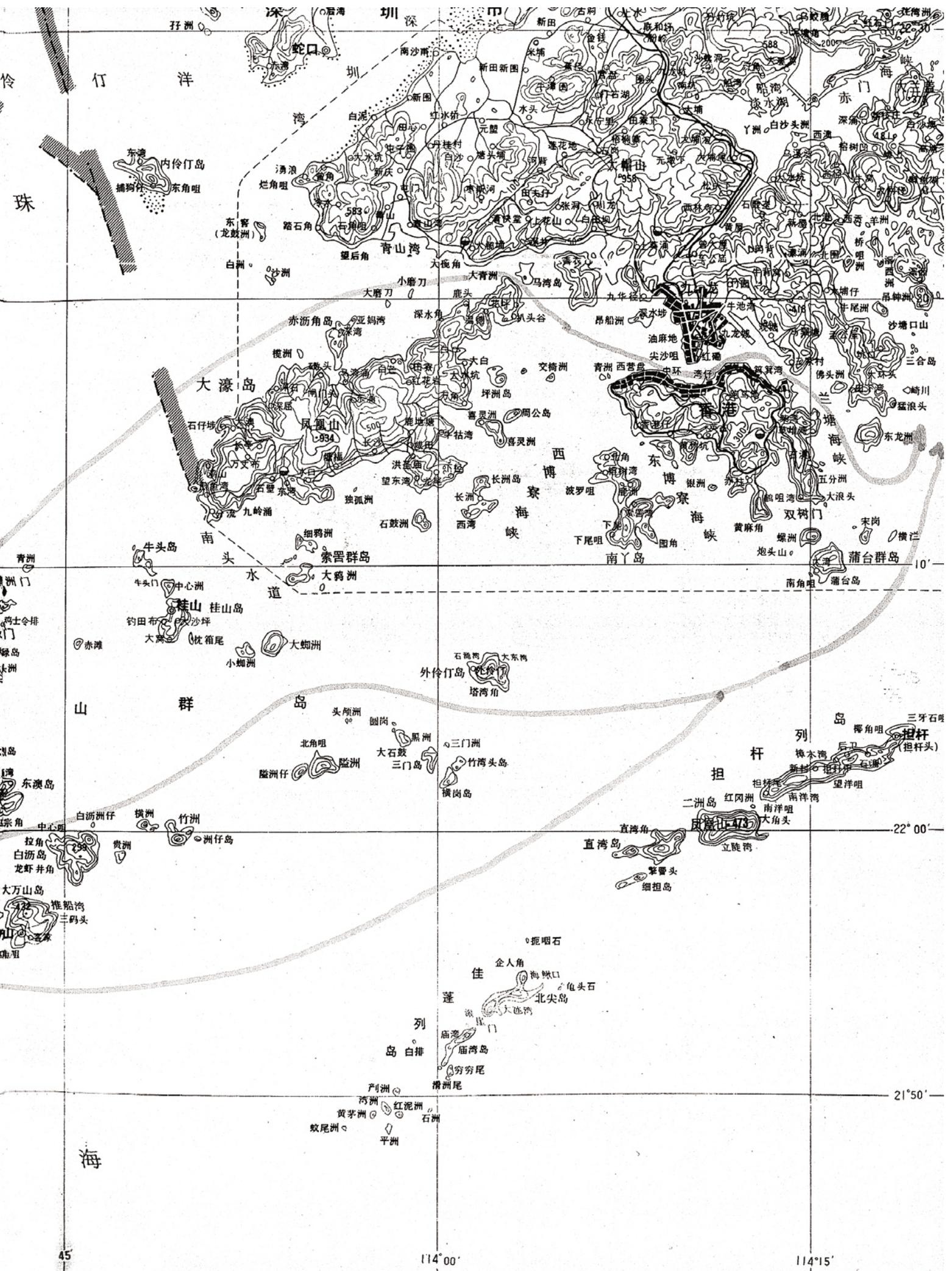
本文寫成後，於2003年9月，乘應邀赴澳門參加“澳門—葡語世界學術研討會”之際，帶到澳門，想查對一下古代葡人航海圖後就交稿，但會議上收到基金會發給《東西望洋》一書，內載金國平先生〈從西方航海技術資料考 Tumor 之名實〉一文，恐會涉及本文所論主題，會議期間又無暇細讀，因此又把稿帶回北京。讀後，感到有必要討論，但為不打亂原有成文，特在文末作此補論。

該文引證了16世紀荷蘭人打入葡涉印度活動的林旭登著述的中日航路，和一葡籍引水員的從澳門至日本的航行日誌中涉及今大嶼山東涌的內容，並展開論證，得出在他以前的文章中同意過的大嶼山基礎上進了一步的具體地點。引入西方航海資料使新文較前文又有進步，但仍存如下問題：

一、該文引了林旭登書中從廣東浪白島去日本，先經閩南的浯嶼、詔安一段話，說葡船是從浪白出發繞經大嶼山島北側東涌、九龍、急水門而北



(圖15) 葡船從浪白澳往日本經珠江口合理航路示意圖 (連右頁)



航閩南的⁽¹⁰³⁾，並以我國清康熙末成書的《指南正法》中“北太武往廣東山形水勢”一段話作對證，北太武是指閩南金門島上一座山嶺，是該島港口的一座天然航標，代表出發地港埠。這段話確實講到從福建來的船徑九龍、急水門那條航路。但是這兩條航路不具有完全可比性，不能同日而語。因為從閩南到廣州港去的中小商船走這條航路既貼大陸沿岸安全，又是捷徑近路。而葡人大帆船從位居澳門西南的浪白港起航往閩南，如走上上述反方向的同一航路，顯然是兜一個圈子走彎路。這對於遠涉大西洋、印度洋的葡人遠洋大帆船而言，不需也不該這樣走。直接從佳蓬列島—擔桿列島與大嶼山—三門列島間的水道東航，或穿越萬山群島南北二組島群間水道，經外伶仃島南向東航，然後折北西航就是。而且走前一條航線，多有屯門、九龍、佛堂門等中國海防軍監管。不笨的葡萄牙航海開拓者們是不會幹這種雙重復事的。（參見附圖15航路示意圖）

至於清代《廈門志》中所載《水師輯要》從廈門往廣東的航路，指示經佛堂門、大急水門、新安縣的赤坂、大嶼山即大嶼山的異寫名也是明指“北入廣城〔按指廣州內港〕，至黃田一坡、虎頭門、至魚珠〔按黃埔港區〕至省城；南往大嶼山”。⁽¹⁰⁴⁾在浪白港時期的葡船往日本既不須去省城也不允許去省城，何用經大嶼山？此其一。

其二，引林旭登的話：“……有一個海灣，華人船隻來此交換商品。它距離 Lanton 開闊處不遠。華人稱該島為東涌（Tongquo）。”⁽¹⁰⁵⁾該島華人居民怎麼會不稱自己熟悉的所在地當時通行的地名大嶼山，而把港名“東涌”充作島名呢？很難令人信服。如果說外國船員如此誤解，那倒有可能。

其三，葡人早期來廣東曾佔據東涌港灣地方，不是不可能。但問題在於所引用論證的資料，沒有任何可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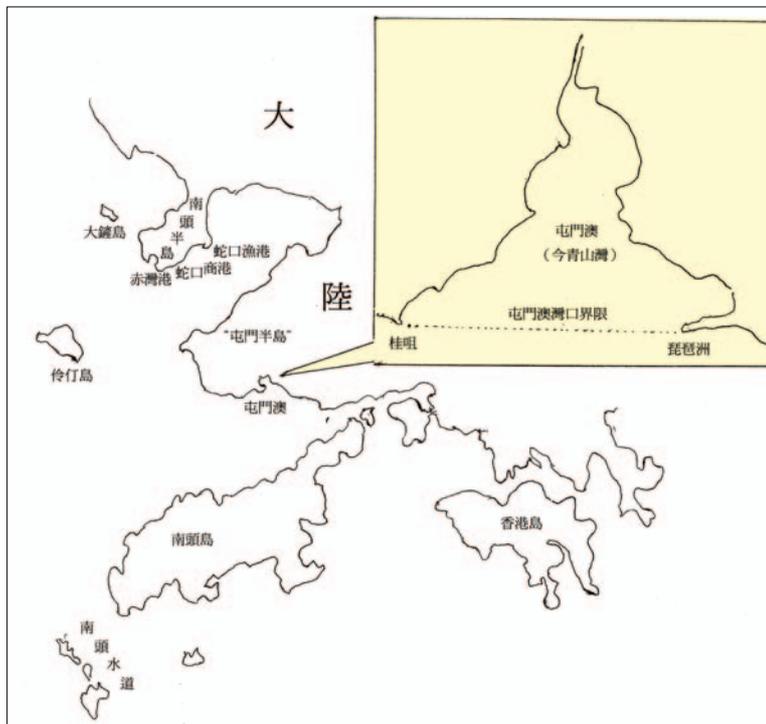
1513年葡人在該島豎葡圖“發現紀念”石柱、埋葬阿爾瓦雷斯兒子、1517年費爾南駐船於此、1518年西蒙建碉堡作據點的內容，因而不能用它來論證那裡是初來葡人佔據地。既然沒有葡人在島上活動的內容，怎可跳躍地得出“佔據為屯門海澳中的東涌”呢？

二、該文稱：“‘屯門澳口’指屯門與大嶼山之間的水域”⁽¹⁰⁶⁾，此說錯了。所謂“澳”，現代嚴格意義是指海灣的深入部分。僅以筆者所到的見有浙江省的東清澳是樂清灣的深入大陸部分、遼寧省的老虎灘澳是大連灣的深入部分。但過去稱“澳”，通常等於今稱“灣”，如青島港所在地在19世紀時稱“膠澳”，1898年清廷與德國簽訂條約名為《膠澳租界條約》，20世紀前期出版的書籍《膠澳志》。所謂“澳口”即今稱“灣口”。

灣口界限並非可任意解釋的，它有國內國際共識的規範概念，否則會引起航海、海防、築港工程等方面的混亂。按《水運技術詞典》釋文：“海灣

(gulf)，海岸線向陸地凹進所圍抱的海水域。……海灣的界限，一般以入口地方海角之間的聯線作為與海洋的分界”。⁽¹⁰⁷⁾如膠澳即膠州灣澳口介於團島咀和子石咀之間，其水域限於該兩海咀聯線之內。“屯門澳口”實即屯門澳。其水域指今青山灣內改造前水域，其界線是環抱該澳東介於琵琶洲與其西約2.5海里的柱咀之間的聯線以內水域。聯線以外即灣口以外與大嶼山北岸之間，特別是大澳—東涌段的開闊水域，更不能算作“屯門港口”水域。這並非是筆者個人見解，而是歷來共識的技術規範概念，即使所謂非狹義的“屯門澳”，也不宜如此劃定（見附圖16）。

三、該文稱：“上述考證使我們可以得出……Tumon 島是大嶼山，Tumon 港為東涌這一結論。”從求實精神出發，我祇好冒昧地說：歸宿是對的，但論證理由深感欠缺。希望作者努力發掘出能說明問題的有關葡方史料，這是大家共同寄予的期望。



〔圖16〕屯門澳灣口界限兼大嶼山、南頭半島、“屯門半島”、南頭島

【註】

- (1)(2) 筆者以往引述英文轉譯，現改以葡文直譯的金國平《西力東漸》頁26、35-36。
- (3)(4) 載中外關係史學會、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外關係史譯叢》第4輯，頁279、281-282。
- (5)(6) 轉引《西力東漸》頁28、32。
- (7)(8) 引自《西方東漸》頁30、26。
- (9) 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頁9。
- (10) 轉引自張天澤著、姚楠等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版，頁10。
- (11)(12) 《正德實錄》卷一四九；卷一九四。
- (13)(17) 轉引自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官守篇，重邊防以蘇民〉，頁19、39。
- (14)(15)(明)黃佐：《廣東通志》，卷六六，〈番夷〉；卷七，〈事紀五〉。
- (16)(明)葉春及：《順德縣志》，卷七，頁11-12。
- (18) 收錄於嘉慶本《新安縣志》，卷二三，〈藝文二〉。
- (19) 張維華主編：《中國古代對外關係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頁308-309。
- (20)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十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頁405。
- (21) 吳緝華：《明代社會經濟史論叢》，臺灣學生書局1970年版頁435。
- (22) 《廣東省海域地名志》頁157。
- (23) 深圳博物館：《深圳古代簡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 (24) 載《深圳文史》第四輯，深圳市海天出版社頁210。
- (25) 《永樂大典》卷一一九〇六，解縉等輯，永樂六年。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第九冊頁8392，廣州府圖經志。
- (26)(清)王崇熙：《新安縣志》嘉慶二十四年(1819)版卷七，建置略。
- (27) 深圳博物館：《深圳古代簡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明應欉等：《蒼梧軍門志》。
- (28)(清)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二，人民大學清史室影印本。
- (29)(清)靳文漢：《新安縣志》，康熙二十七年(1688)版地理志之三，影印頁16。
- (30) 廣東省測繪局：《廣東省縣圖集》，1982年版頁12，珠海市、澳門圖。又：《中國航路海指南》亦稱“南頭水道(大濠水道)”。
- (31) 劉重日等：《中國史稿》，人民出版社，1987年，冊6，頁597-598。
- (32) 轉引自《南頭風情》，深圳市海天出版社1990年版。
- (33)(明)黃佐：《廣東通志》，卷三一，〈政事四〉，戰船。
- (34) 轉引自《籌海圖編淺說》，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頁42。
- (35)(明)應欉：《蒼梧提督軍門志》，〈廣東圖〉。
- (36) 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明)郭棐：《粵大記》，萬曆三十年版，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
- (37) 轉引自《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6年版，頁78。但不應譯作“南頭寨”，應是南頭備倭總兵府。
- (38)(39)(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中頁50、54，清康熙杜氏經緯堂刻本。圖縮微膠卷。
- (40) 《蒼梧總督軍門志》卷五，輿圖。
- (41) 同前《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
- (42) 李德超〈澳門得名之由來與葡人初來地大門島考〉，載《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香港珠海文史研究院。
- (43) 《中國航路指南(民用)》第三卷，頁104-105，中國航海圖書出版社，1978年。
- (44)(45) 沈思：〈大嶼山地名的考證〉，載《中國地名考證文集》，廣東地圖出版社1994年版頁242；頁242。
- (46) 曹淳亮主編《香港大辭典》，廣州出版社1994年版頁26、615、616。
- (47)(葡)托梅·皮雷斯：〈東方諸國記〉，載《中外關係史譯叢》第四輯，頁283，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
- (48)(49)(52) 《中國航路指南(民用)》，中國航海圖書出版社，1978年版，卷3，頁98、99、63、62、104、97；頁104-105；頁97。
- (50)(51) 《中國海圖》，中國航海圖書出版社，1981年第1073；1981年版第65-1041號。
- (53) 同前《廣東省縣圖集》頁12。施存龍：《中國水運地理詞典》，交通部水運研究所，1979年刻印本。
- (54) 明慧：《大嶼山志》，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影印本。
- (55) 《香港旅遊圖》，廣東地圖出版社1986年版。
- (56) 載同前《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頁99。
- (57) 載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基金會2000年版，頁44。
- (58) 載(英)博克塞：《16世紀中國南部行紀》，C. 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xxxiv.
- (59)(61)(62) 原載澳門海事博物館1996年再版《歷代澳門航海圖》第4章，引《文化雜誌》第35期，頁204；頁207；頁209。
- (60)(63) 同前《西力東漸》，頁44；頁46。
- (64)(65) 載《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臺北中央研究院，1986年版附圖十一。
- (66)(70) 轉引同前《西力東漸》，頁74；頁47。
- (67)(68) 《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頁777、779、781。
- (69) 載《海交史研究》，中國海外交通史學會1999年第1期，頁69及頁75註(47)。
- (71)(72) 載中國地名學研究會編：《中國地名考證文集》，廣東地圖出版社1994年版，頁241；頁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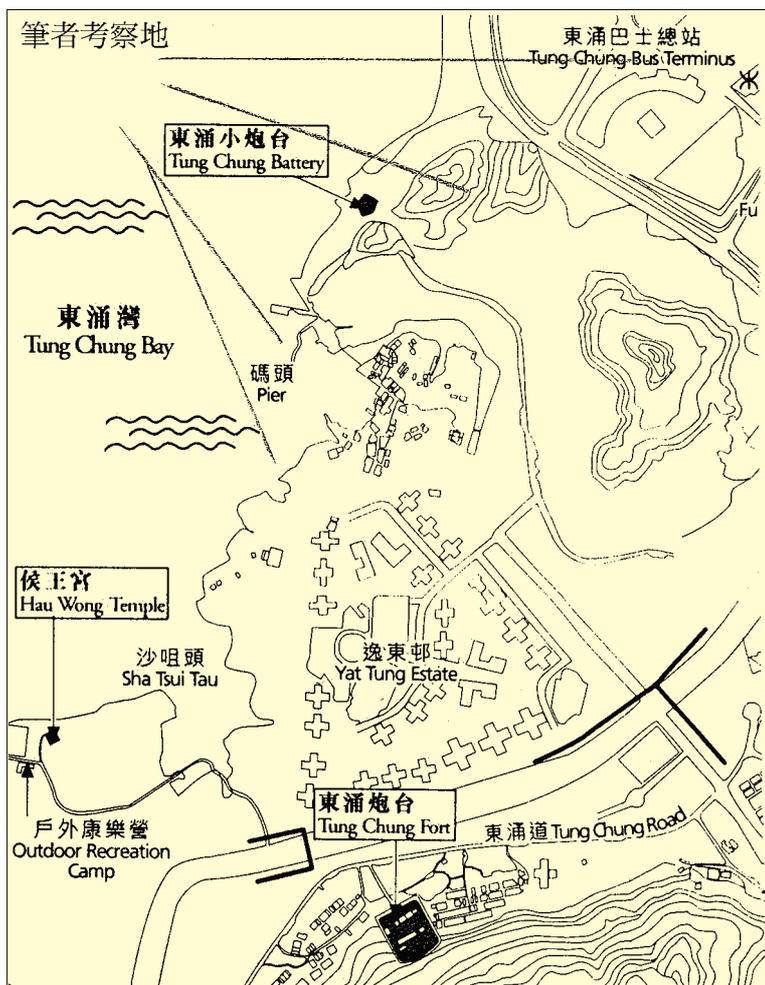
- (74)(75) 同前《西力東漸》，頁48。
- (76) 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9年版，頁7。
- (77) 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嶠嶺春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頁163。
- (78) 載古物古蹟辦事處編：《香港文物》1992年版頁16、17。
- (79)(81)(82)(83)(85)(86) 伊姆斯：《英國人在中國》(J. B. Eames, *The English in China*) 頁15，1974年倫敦再版。轉引自《十九世紀的香港》，中華書局1994年版。作者余繩武。頁24；頁30；頁31；頁49。
- (80) 丁又：《香港早期史話》，三聯書店。
- (84) 原見〈羅賓遜致巴黎導函〉，1935年4月13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17/9。轉引同(79)頁33。
- (87) 葉靈鳳：《香港掌故》，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頁519-521。
- (88)(89)(90) 載同前《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二冊，頁72、78、76-77。
- (91) 全註(42)。
- (92)(93)(94)(95) 同前《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頁107、100；頁100。
- (96) 見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基金會2000年版頁283。
- (97)(98)(99) 同前《西力東漸》。頁38；39；38。該圖亦載多明我會克魯神父1569年版《中國情況》，澳門博物館1996年葡中文對照版。
- (100) 《中國航路指南(民用本)》第三卷，中國航海圖書出版社1978年版，頁104。
- (101)(102) 同前《西力東漸》。頁45；48。
- (103)(104)(105)(106) 載《東西望洋》，澳門成人教育學會年版，頁265。
- (107) 《水運技術詞典》：《港口與航道工程分冊》上冊，人民交通出版社1983年版頁30。

【附錄】南頭島古代港灣今況實地考察

2003年11月9日，我專程從香港島出發前往南頭島即又名大嶼山幾個主要古港灣考察。

一、先去梅窠港。此港是明代《粵大記》一書圖上明確標繪的地名之一。位於該島東南岸，處北緯22.16度，東經113.59度。船從銀礦灣駛入。該灣口向東南張開，灣呈西北向東南走向，灣底有一條小河(當地稱“涌”)注入，灣底沿岸現有一系列碼頭，包括輪渡碼頭在內。灣三面有丘陵，有利於避風。現有銀礦瀑布和銀礦洞遺跡，過去開採的銀礦石或粗煉銀錠必由此裝船輸出。現有九個村，以前港後面村莊分佈如五瓣梅花，又地處群山環抱的谷地，平坦低陷如盆，故稱“梅窠”，現成島南水陸交通樞紐，原有農民已轉業從事旅遊服務飲食業等。推想明代時中外商船潛泊於此走私貿易，就港灣和居民條件論，不無可能。但葡人在此建據點的可能極小，一因距進出廣州內外港過於偏遠，而該島有更合適的港灣可供選擇。至於葡人臨時停泊一下亦有可能，但無史料證明(照片)。

二、接着，從公路穿越該島到大澳港。“大澳”也是明《粵大記》圖上標繪的。位於該島西北側，處北緯22.15度，東經113.51度。灣口朝西，灣底由一河川型港汊自西南向北深入。三面



東涌灣考察示意圖



從裡往外望東涌灣



從外往裡望梅窠港



從裡往外望大澳港

環山，可避東及東南風。原為漁鹽港，現成一旅遊觀光地，但仍有漁業，仍可見漁村風貌。港汊兩岸形成街市，多出售漁產乾製品，岸兩旁水上仍多水上棚屋，以木樁立在水中為屋的樁基，是以船為家的漁民定居過渡形式。當地居民以小艇作村內交通工具。外地旅遊者欲往來港汊兩岸港市，見過去照片是用繩索拉渡船，現見架了橋樑。灣底山前有

座建於1488-1505即明代弘治年間也就是葡人初航到珠江口之前幾十年，這裡已有一定人口的聚落。還有天后廟，說明當年已有一定數量的信仰者航海漁民存在。現香港政府宣佈為香港地區港口之一。考察該港灣是適合古代較大木帆船寄泊的，其地理位置近進出廣州內港和外港的屯門澳。綜合考慮，有可能被葡人選作初來據點。

三、最後考察東涌港。《粵大記》圖上標作“東西涌”。位於該島北側中部，處北緯22.17度，東經113.55度。南與鳳凰山相連。進港口門介於北面赤蠟角西角與其南的沙螺灣西角之間，口門向西張開，經東西向的港汊深入，進入口小腹大的東涌灣，由灘頭、東涌、沙咀頭、馬灣涌等地環繞。灣北原來赤蠟島現經人工填海築為略呈梯形的新飛機場，該港掩護條件大為改善。灣底亦有一條小河自南向北注入。即使退回到自然狀態時，該灣北面的赤蠟島雖為一南北略呈棱形島嶼，沒有現在掩護好，但還是有一定掩護作用，而該灣兩面有山體環抱，可避東、西、南三面風。現周圍有二十四個村莊。20世紀末，已興起高樓大廈、鐵路、汽車樞紐站，成為該島現代化城市新亮點。但灣畔仍保存古代石獅炮臺遺址（待考年代）、沙咀頭古侯王宮（紀念南宋楊亮節，乾隆時建）、東涌寨城（1832年建）。該港離葡人來廣東初期貿易的屯門澳最近。

清代《廣東通志》稱：“司按略：新安縣屬大嶼山，孤懸海外，四面皆水，為各夷船必經之處，內惟大澳口、東涌口二處可以收泊。其東涌口向無汛房，惟大澳口額設守兵十三名，山上向有雞翼炮臺，係大鵬營千總駐守……”這是明末清初情形，返顧明正德葡人初來時尚未設砲臺和駐常兵，根據上述地理位置，港灣條件等考慮，葡人選大澳或東西涌為據點很有可能，而東涌因比大澳更近屯門澳，從1521年中葡首次軍事衝突“屯門之役”在屯門澳，據點在東西涌更具可能。

以上三港情況，除筆者考察直觀外，還參考了以下文獻、書籍：

清《新安縣志》、《廣東通志》。

樊桂英等《香港地名詞典》，中國社科出版社1999年版有關各條。

曹淳亮主編《香港大辭典》，廣州出版社1994年版頁26有關係。

香港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古物古蹟辦事處《東涌懷古》，2003年版。